

## 附录

**编者按：**我们在研究甯氏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觉得很有参考价值，但在我们的书稿正文中，又不便全文引用，殊为可惜。为了方便后人研究，特加选择附录于此，以供参考。

### 一、《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碑文校正

覃圣敏

（此以民国三十五年《钦县县志》所录碑文为蓝本，参照《灵山甯氏族志》所收原碑文拓片影印件、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对校；底代红色横线之字当误或有疑问，在注中加以说明。原碑文不分段落，这里为笔者按其文义所分。碑文的最后诗文，《钦县县志》以四句为一行，这里依之。）

窃以太暉之末，分颛臾之邦；唐叔<sup>[1]</sup>之余，为管鲁之国；邵公思室，赋裳棣之诗；辛<sup>[2]</sup>有哀本，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自结贞筠之条；宗子维城，各理封疆之邑。故甯相、甯渝，傅昆玉之名；甯喜、甯戚，纾遗芳之哲。

公匡衡<sup>[3]</sup>在辅，无忘士蔦之工；从而能政，追踪子范之用，所以繁衍陵穆，盘根闽越者哉！公讳贇，字翔威，冀州<sup>[4]</sup>临淄人也。公惠好自研，齐叔<sup>[5]</sup>嚮之德；箴<sup>[6]</sup>诚和诱，同孟明之温。儒藻进贤，常吟雅颂；肃严爱善，宫圻<sup>[7]</sup>之美。

祖逵，驰千载仁风，拥六奇高辩，警加木铎，训说<sup>[8]</sup>过庭。梁武皇帝，除定州刺史，总督九州诸军事；陈宣武皇帝，又除授安州刺史。父猛力，德贯神皇<sup>[9]</sup>，气冲牛斗，与<sup>[10]</sup>礼政事，隋会无闻。卒乘辑<sup>[11]</sup>睦，先谷怀让。文皇帝除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兄长真，包山岳之志，操云霞之襟，行应管钟，义通泉涌，褰帷<sup>[12]</sup>本土，刺举家邦；节尽中朝，风纯面海。帝【授上仪同三司钦州刺史，立功于国，勅加官赏，寻进上开府仪同三司、钦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轩车簿伐，戎马专征，又为行军总管；言旋荷戟，犹虎会之独清；勋入司门，类武安之奉诏。仍转上大将军。其年，改右光禄大夫甯越郡太守。爵名参塞，成似班超之】<sup>[13]</sup>官；职抚奋闾，还若淮阴之封。以昔方今，盛哉而已。

公履端器量，增万顷之渊；舍翰纵容，踰四学之励。开皇十四年，帝以公衣

冠子胤，远来入朝，既秉诚心，宜升戎秩，授大都督<sup>[14]</sup>，厚赠缣缯，偏加享礼。以公长榆之变，李氏弱乎区分；细柳之搆，条侯反存无策<sup>[15]</sup>；南定交趾之川<sup>[16]</sup>，北靖苍梧之野。仁寿二年，诏公兄弟建弘，宣扬国化，嗣位牧民，抚甯蕃部，宜如荣秩<sup>[17]</sup>，用优恒典，增上仪同三司。到大业二年，帝以公骤从戎蹟<sup>[18]</sup>，克著嘉庸，拜上仪同三司，余官如故。公沈神帷帐<sup>[19]</sup>，竞羊祜之谋；条备缮完<sup>[20]</sup>，规<sup>[21]</sup>臧宣之度。披图三略之精，麾师九围之勇。云梯再起，鱼骊迭<sup>[22]</sup>兴。维兄及弟，陈兵林邑；推锋振旅<sup>[23]</sup>，以先启行，前茅虑无，中权后劲<sup>[24]</sup>；浮赤<sup>[25]</sup>雀以泛白波，擢赤马以排绿浪。凭轼相临，云横百阵地。靡旌摩垒，有许伯之雄；斩馘掉鞅<sup>[26]</sup>，摸摄叔之势。故得卧彼鼓旗，投衡拔旆，困兽犹斗。铺舶新墉之江，出寇<sup>[27]</sup>阨缘之海。贼舫千乘，公舟二十，旭日帜交，深<sup>[28]</sup>霄未止。公策运在标，拥以楼船五鷁<sup>[29]</sup>，偏师檄队，得溃彼豺狼；争舟指掬，芟夷扑灭<sup>[30]</sup>，尽殪凶徒。献捷镌地，马伏波惭色以颜<sup>[31]</sup>；获神纳俘，檀和之愧乎其道。公巡历三军，皆如挟纩；声播百官<sup>[32]</sup>，咸仰斯茂。大业二年十月，驰谒承明，躬亲廷阙，乃受开府仪同三司，即其年改为正议大夫。公刑仪燮<sup>[33]</sup>越，子张非其人；容袞<sup>[34]</sup>簪裾；陆机失其侣。柳蒲早悴，风烛易迁；靦闵既多，灵芝是乏<sup>[35]</sup>。恻以大业四年岁次戊辰正月十九日<sup>[36]</sup>，终于私宅，春秋卅有五。呜呼哀哉！树绝大夫之阴，营息将军之号！市停三日，悲盈一邦。太息嗣叔，于终于始。维明维孝。大业五年归旧所，密松连盖，疏杨迴吟。言念君子，其铭云尔：

火烈<sup>[37]</sup>承宗，相土师农；生民厥始，社稷根踪。

凤凰垂翼，幽都受封；支传帝业，祠纂<sup>[38]</sup>高龙。

棠阴理颂，周□习<sup>[39]</sup>礼；合美闽越<sup>[40]</sup>，德隆蕃邸<sup>[41]</sup>。

仁镜长明，智花恒启；游艺自依，多能备体。

文著马鞭，行崇基陞<sup>[42]</sup>；义水泝泝，□泉泚泚<sup>[43]</sup>。

建国兴<sup>[44]</sup>邦，纯守边疆<sup>[45]</sup>；威流五岭，勇振三湘。

临淄粉溢，昭穆邱长<sup>[46]</sup>；帷<sup>[47]</sup>开策运，楼移势章。

梯冲云<sup>[48]</sup>□，城<sup>[49]</sup>衔月光；旗影飞地，剑抱星芒。

烽连柳塞，阵台渔阳<sup>[50]</sup>；舟移鷁转，棹动兰芳。

董蒲叶<sup>[51]</sup>，秦糜丽张：朝□□将<sup>[51]</sup>，野号贤良。  
 卿士维<sup>[52]</sup>相，参与是匡。摇落衰<sup>[53]</sup>变，原隰孤平。  
 似盖树委，如楼鼓横；悲凄韵<sup>[54]</sup>谷，哀惨松声<sup>[55]</sup>。  
 □□徒从，终传令名<sup>[56]</sup>。

大业五年四月。

（注：以下尚有边款，但字迹不清，能辨认的有：“  
 文 铜制黎军  
 长沙 刻。”）

[1] “叔”字拓本看不清，疑为“州”字。

[2] “辛”字拓本看不清，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认为“幸”字，可取。

[3] “衡”字不误，有拓本可辨。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标为“ ”，不确。

[4] 此处“冀州”，拓本实为“巽”字。但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巽州”之名，且与临淄相连，知当为冀州。故辨为“冀州”不误，但与原碑不符。正确的标注应为“巽（冀）州”。

[5] “叔”字疑为“升”字。

[6] “箴”字，拓本实为“箴”字。

[7] “圩”字恐误，但拓本看不清，难以辨认。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认为“墉”字，近之。

[8] “说”字，拓本实为“悦”字。

[9] “德贯神皇”的“皇”字，拓本为“皇”字少顶上的一撇，不知何字。从其下文“气冲牛斗”看，疑为“星”字。

[10] “与”字，拓本实为“典”字。

[11] “辑”字恐误，拓本左边为“车”，但右边上半不清，下半清晰为“月”。查字书，该字似为将“捐”的提手旁改为车旁，此字与“左车右尹”字同，为车弓之义。

[12] “帷”字，拓本实为“帷”字。

[13] “【】”内此段文字，《灵山甯民族志》影印件有缺，无法校对。该书第207页最后一字为“帝”字，第208页第一字为“官”字，无法接读。其中的“勅加官赏”的“勅”字和“赏”字，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辨为“效”字、“尝”字，不确。

[14] “大都督”的“督”字，拓本不大清楚。其下部为“手”，上部似为“带”，字的上半，似乎并非“督”字，但为何字，尚未查到。

[15] “策”字，拓本作“上部草头下部为宋”，为“策”字俗体。

[16] “川”字，拓本似为“州”字。

[17] “宜加荣秩”，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宣加荣秩”，误。

[18] “蹟”字，拓本实为“践”字。

[19] “沈”字，拓本实为“沉”字。“帷帐”，拓本实为“惟帐”。

[20] “条备缮完”中的“条”字、“完”字，拓本不很清楚，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修”、“兒”近之。

[21] “规”字，拓本实为“现”字。

[22] “迭”字，查拓本并无此字。但从句式来看，当阙一字，为“云梯再起，鱼骊□兴”，但“迭”字从何而来，不详，姑且从之。

[23] “旅”字，拓本不很清楚，其左边为提手旁而非“方”字旁，故疑为“攘”字。

[24] 此三句的断句，恐怕不确，疑为“以先启行前茅，虑无中权后劲。”

[25] “赤”字，拓本实为“青”字。

[26] “斩”字恐误，拓本不清，似为“一”字：“掉”字，拓本亦不清，疑为“擄”字。

[27] “寇”字，恐误，看拓本，此字上为“写”字的头，下部左边为“示”部，右边上“口”下“文”，但字未查到此字，疑为“设”字的异体。

[28] “深”字当误，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浸”字，得之。

[29] “拥”字疑为“权”字：“楼船”，拓本实为“楼舡”，“舡”为“船”的异体字。

[30] “扑灭”二字，拓本不清，可疑。

[31] “颜”字，拓本颇似“頰”字，但仔细分辨，其左半部为“炎”字，应为“颜”的异体字。

[32] “官”字，拓本仅见上部宝盖头。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方”字，不如“官”字更为接近。

[33] “楚”字，拓本不清。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百”，近之。

[34] “袞”字，可疑。拓本此字为上商下衣，新版《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裔”字，近之。

[35] “乏”字，拓本实为“之”字。

[36] 看拓本，“恸”字疑为“急”字。原文“岁次戊”三字，拓本看不清。

[37] “烈”字，拓本实为“纪”字。

[38] “纂”字，拓本上部为草头。

[39] “习”字，拓本看不清。

[40] “合”字，拓本实为“令”字。“美”字，拓本仅见上半部。

[41] “邸”字，从拓本近似“邱”字，但是从其上下文的韵脚“札”“启”“体”来看，“邸”合韵而“邱”不合韵，故仍依“邸”字。

[42] “陞”字，拓本为土字旁，应为“陞”的异体字。

[43] “义水泔泔，□泉泔泔”，其中“泔”“泔”，拓本依稀可辨，但第二个字看不出。新编《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作“义水泔泔，醴泉泔泔”，未知所据。

[44] “兴”字，拓本未见。

[45] “纯”字，从拓本看不像，但为何字，难断。原文“疆”字，拓本为左土右量，应是“疆”的异体字。

[46] “邱”字，拓本实为“丘”字。

[47] “帷”字，拓本实为“惟”字。

[48] “云”字，拓本缺。

[49] “城”字，拓本缺。

[50] “台”字，拓本实为“合”字。“渔”字，实为“鱼”字，标注应是“鱼（渔）阳”。

[51] “将”字，拓本缺。

[52] “维”字，拓本实为“唯”字。

[53] “衰”字，拓本当为“襄”字。

[54] “韵”字，拓本实为“龍”字。

[55] “哀惨松声”，拓本除“松”字外，其余三字均看不清。

[56] “□□徒从，终传令名”两句有误，拓本实为“□□从终，传令传名”。

### 校正后之碑文如下：

窃以太暉之末，分颛臾（项）之邦：唐叔之余，为管鲁之国；邵公思室，赋裳棣之诗；幸有哀本，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自结贞筠之条；宗子维城，各理封疆之邑。故甯相、甯渝，傅昆玉之名；甯喜、甯戚，纾遗芳之哲。

公匡衡在辅，无忘士薦之工；从而能政，追踪子范之用，所以繁衍陵穆，盘根闾越者哉！公讳贇，字翔威，異（冀）州临淄人也。公惠好自研，齐叔嚮之德；葳诚和诱，同孟明之温；儒藻进贤，常吟雅颂；肃严爱善，宫墉之美。

祖逵，驰千载仁风，拥六奇高辩，警加木铎，训悦过庭。梁武皇帝，除定州刺史，总督九州诸军事；陈宣武皇帝，又除授安州刺史。父猛力，德贯神星，气冲牛斗，典礼政事，隋会无闻。卒乘辑睦，先谷怀让。文皇帝除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兄长真，包山岳之志，操云霞之襟，行应管钟，义通泉涌，褰帷本土，刺举家邦；节尽中朝，风纯面海。帝授上仪同三司钦州刺史，立功于国，力加官赏，寻进上开府仪同三司、钦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轩车簿伐，戎马专征，又为行军总管；言旋荷戟，犹虎会之独清，勋入司门，类武安之奉诏，仞转上大将军；其年，改右光禄大夫甯越郁太守。爵名参塞，威似班超之官；职抚奋闾，还若淮阴之封。以昔方今，盛哉而已。

公履端器量，增万顷之渊；舍翰纵容，踰四学之励。开皇十四年，帝以公衣冠子胤，远来入朝，既秉诚心，宜升戎秩，授大都督，厚赠缣繒，偏加享礼。以

公长榆之变，李氏弱乎区分；细柳之搗，条侯反存无策；南定交趾之州，北靖苍梧之野。仁寿二年，诏公兄弟建弘，宣扬国化，嗣位牧民，抚甯蕃部，宜加荣秩，用优渥典，增上仪同三司。到大业二年，帝以公骤从戎，践克著嘉，庸拜上仪同三司，余官如故。公沉神帷帐，竞羊祜之谋；修备缮完，现臧宣之虔。披图三略之精，麾师九围之勇；云梯再起，鱼骠兴维。兄及弟陈兵林邑；推锋振攘，以先启行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浮青雀以泛白波，擢赤马以排绿浪。凭轼相临，云横百陈。靡旌摩垒，有许伯之雄；一馘掬鞅，摸摄叔之势。故得卧彼鼓旗，投衡拔旆，困兽犹斗，铺舶新墉之江，出没陲缘之海。贼舫千乘，公舟二十，旭曰帜交，浸霄未止。公策运在标，权以楼舫（船）五鹞，偏师檄队，得溃彼豺狼：争舟指掬，芟夷□□，尽殪凶徒，献捷鏖地。马伏波惭色以颜；获神纳俘，檀和之愧乎其道。公巡历三军，皆如挟纊；声播百官，咸仰斯茂。大业二年十月，弛謁承明，躬亲廷阙，乃受开府仪同三司，即其年改为正义大夫。公刑仪越，子张非其人；容衮簪裾；陆机失其侣。柳蒲早焯，风烛易迁；靦闵既多，灵芝是之。奄以大业四年岁次戊辰正月十九日，终于私宅。春秋卅有五。呜呼哀哉！树绝大夫之阴，营息将军之号！市停三日，悲盈一邦。大息嗣叔，于终于始。维明维孝。大业五年归旧所，密松连盖，疏杨迴吟。言念君子，其铭云尔：

火纪承宗，相土师农；生民厥始，社稷根踪。  
凤凰垂翼，幽都受封；支传帝业，祠纂高龙。  
棠阴理颂，周□□礼；令美闽越，德隆蕃邱。  
仁镜长明，智花恒启；游艺自依，多能备体。  
文著马鞭，行崇基陞；义水□□，□泉□□。  
建国兴邦，纯守边疆；威流五岭，勇振三湘。  
临淄粉溢，昭穆丘长；帷开策运，楼移势章。  
梯冲云，城衔月光；旗影飞地，剑抱星芒。  
烽连柳塞，阵合鱼阳；舟移鹞转，棹动兰芳。  
董蒲叶尽，秦糜丽张；朝□□将，野号贤良。  
卿士维相，参与是匡。摇落襄变，原隰孤平。

似盖树委，如楼鼓横；悲凄龍谷，哀惨松声。

□□从终，传令传名。

大业五年四月。

## 二、《隋正议大夫甯贇碑》序

甯可风

史称南海以西溪洞，自六朝以来，甯族最大，世为俚帅，修其教而不易其俗，蛮僚皆归之。陈祯明时，甯猛力为安州刺史，役服不宾，输贡于陈。陈亡，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而生，当继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进；至开皇中始归顺。其子长真继之，南定交趾，北靖苍梧；又率部众数千，从炀帝征辽东有功，授上大将军、甯越郡太守。武功炬赫，为岭南所罕见。猛力又以同怀弟暄分守合浦，子纯继之，均能以诗书教其族人，善抚其众，蛮族向化。唐武后永昌元年，甯原悌出荒服，与张柬之同登上第，惊动朝野，历官至谏议大夫，开百越文化之先河。隋唐各书所载诸甯列传，只称为钦江人，而不知其所从自。迄今，我粤钦县、合浦、灵山、防城、吴川、化县及桂南之玉林、陆川、博白、兴业、横县等地，甯氏聚族而居，数达数十万众。惟一稽其谱牒，无有超越明代以上者。祖系之失传，至无典可数，殊为憾惜！清道光六年，钦州人耕于七星坪，获甯贇碑。碑文三十行，每行三十九字，高三尺二寸，广二尺一寸，顾损一角。宣统元年，土人犁田复寻获一角，符合原碑。考其文句，知猛力之父为甯逵，冀州临淄人，梁武帝时，除定州刺史。陈宣武帝改除安州刺史，来镇越中。再传猛力，三传长真。甯贇乃长真之弟。民国九年再掘得刺史甯道务墓志铭。信宜林绳武考证其四世为甯璩，五世为道务，均世为刺史。挈齐鲁文化，移植于南越象郡西偏，举归领治者，垂二百年，至开元而不替。百越中以姓名其郡者，甯越以外，未之有闻。廉州知府张育春，以甯贇碑文字近蔡、钟二家，铭词尤古雅，足入岭南金石首选。夷考六朝以前石刻，吾粤素无。而隋碑之发现者，亦仅三石：一曰刘猛进，初为四川王秉恩购藏，后归新会简又文；二曰徐智竦，番禺胡毅生所藏；其三即甯贇碑。猛进、智竦二石，漫漶颇甚，不若甯贇碑之明晰而富于史料也。其价值不仅为甯氏家乘之环宝，尤为岭南金石珍宝，并足以资研究民族政治文化史者之考证。

钦人士嵌置诸尊经阁，珍如拱璧。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日寇轰炸县城，县人士乃将碑埋藏于沙坡村荒地，以保无虞。迨三十五年，主事人蔡夏廷，遍掘园地不可得。三十七年，可风奉檄钦县，复雇工数十名，挖掘数日，亦无所获。痛家乘环宝之云亡，地方金石文献之遗失，乃于今春，向族人募集稻谷贰佰市石，将原碑拓本影印制版，馈赠中外大学及文物馆，以彰史迹而垂久远；并可作家藏珍本，数典以奋踵前徽也。

民国三十八年夏灵山甯可风识

(注：这是甯可风为广东省博物馆所收藏《隋正议大夫甯贇碑》所作之序。甯可风，本名甯君泽，字德润，号可风，系钦州灵山县尧家村福海公第十六代孙，灵山县三海镇司马塘村人，民国时大学毕业后即任灵山县县长，时年二十八岁，继任合浦县、钦县县长，撰有家谱《岭南甯氏家乘初稿》，此家谱今收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甯开鑫供稿，<http://www.ningcn.com> 2003-5-22)

### 三、《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简介

“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简称甯贇碑，无撰书人氏。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秋在今广西钦州（原属广东）七星坪出土。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为避战乱，移埋于沙坡村保存，1959年掘出并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碑高1.3米，阔0.92米。碑首有穿孔，尚属汉代遗制。碑额12字，4行分列。碑文楷书，30行，行39字，凡1134字，末署“大业五年四月”，即公元609年。初出土时，左下角陷入土中，诸家著录均云缺13字。其后升碑，获左下角“习、泉、城、将、徒”5字，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四月，钦州知州郑荣并有题记。民国后，州人颇恶郑荣以得碑角5字为己功，以利器铲其字，今尚隐约可见。甯贇碑出土后，诸家均有考证。该碑撰述甯氏家族上溯源流，在南疆繁衍，甯贇名字、籍贯，及其祖、父、兄的才学官职，其本人的才学、官职与军功，以及甯贇的卒年等等，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补文献的不足。此碑虽称碑，实是后来的墓志性质，碑后的铭语是对甯贇的颂赞词。该碑堪称南碑翘楚。



#### 四、《刺史甯道务墓志铭》铭文校正

覃圣敏

(甯道务碑为陶质，无碑额，现在不少文章都把“刺史甯道务墓志铭碑”作为碑额，实是后人加上去的。此以《钦县县志》所录碑文为蓝本，以新编《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对校。底代红色横线之字当误或有疑问，见于注中。)

府君讳道务，字惟清，临淄人也。于甯氏族，肇自太公。挺天然之奇，作稀世之宝，故能虎黑叶卜，龙豹成韬，克甯东土，立□□□，□国于齐壤，列封于甯城；祇台德先，因而命氏。代纂洪绪，史不绝官，可谓源濬流长，根深叶茂。□□时□□而秀气郁兴；□□是人□而宏才间出。或□商歌而入相，或励□学以宾王。公侯子孙，必复其位；后之达者，在府君乎？

曾祖猛力，隋仪同三司、交州刺史，怀杞梓之材，有栋梁之任，具瑚璉之器，为社稷之臣。祖长真，隋光祿大夫鸿胪卿，皇朝钦州都督上柱国开国公。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作衣冠之领袖，为庙廊之羽仪。往以隋运道消，皇唐御历，虑边隅之未义，挥忠良以抚之。靖乱安人，非公不可。下民被惠，翕然向风，美化遍于南州，令德闻乎北阙。累沐光宠，屡降天书。非夫纯臣，畴能宅此？父据<sup>[1]</sup>，皇朝朝请授钦州都督，上柱国开国公之仲子也。巨<sup>[2]</sup>树千寻，垂荫万叶；散余芳于禹甸，布花萼于邦畿，代承衣锦之荣，雅叶画堂之庆。太夫人冯氏，□□□□邦之女也。母仪天授，閭训生知；婉彼幽闲，作嫔君子。冀寿觞之永荐，庶慈颜之克谐，何潘舆之不留，忽奄奄于一息？□□□尽，今古相悲。自非灵仙之俦，孰免凋谢于老耄也。

府君稽松千丈，黄波万顷；威仪肃肃，如临廊庙之忠；气象堂堂，绝无鄙俚之态。幼而颖悟，长而风清，涉猎乎六艺之场，牢笼乎百氏之苑。海内之学，尽在公门。非川岳降神，何以诞生贤哲！□□□□□□拜滚州临漳令；万岁通天年，调补龙州司马。丁太夫人忧，罢职。公执丧尽礼，甯戚靡偷，虽露往霜来，不忘坟墓之思；春归秋至，无亏禴祀之诚。而足年服阙，恭趋<sup>[3]</sup>会府，授爱州司马。长安中，旨授朝散郎，官如闻奏授爱州牧。神龙岁，官依旧。

府君出言无二，法惟画一，权豪丧胆，奸吏亡魂；恩威互施，畏爱□齐。跋

扈□□□□作梗。王师出征，率精甲以从戎，尅职□元帅，立懋功以简帝，旌德策熏。神龙中，授上柱国。景云岁，改牧郁林。公之在官也，□□□之谣；公之改职也，结去思之恋。昔之拔轅卧辙，夫何異斯！开元初，授朝议郎新州刺史，俄迁封州焉。九重之台，兴于经始；千里之路，起自初蹤。历阶必本乎微，升职克符乎著。盛德大业，允属于公。莅郡踰年，遘婴时疾。悲两楹之噩梦，哀梁本之倾颓。大数不留，哲人将逝。春秋五十有六，以疾卒于公廨。里春绝杵，邑稚罢歌；□□奉心，敬追遗志，粉榆<sup>[4]</sup>是恋。魂兮归来，丹旌启行，素车将驾，士庶夹岸以观，僚史<sup>[5]</sup>膜拜而敬。□□年十二月，旋殡于安业乡，礼也。

夫人□氏，隋儋耳太守仁杰之孙，皇朝岩州□□司马□忠之女。合曰天作，秦晋是姻，归于公室。风树不静，逝水恒流；佳城易掩，夜台难曙。嗟色养之长违，□泽余波，奈晨昏之永殂。

长子岐岚，皇朝朝议郎，桂州始安主簿；中子岐茷，荔浦□丞；季子岐雄，未仕。并浑金璞玉，龙驹凤雏。人知其名，莫识其美。生子髻髻之岁，克承诗礼之风；满门修学之英，各擅簪纓之望。顷以悲深厚地，哀贯昊天；同顾氏之绝浆，类高生之□□。□血□哭，□□既往而追□在躬。宅兆所营，允昭乎后嗣；著龟叶庆，爰考乎前经。粤以皇唐开元廿年岁在壬申十一月庚子□□朔廿七日□寅，将迁座于龙门，遂读礼也。寿堂一闭，别即千秋。悲风生于庭树，愁云起于山邱。抚楛悽恻，临埏殒绝。怨白日之易驰，感黄泉之恨结。以为孝者德之本也，德者义之符也。不有幽赞，嘉声葛闻？仆也不才，承始安之厚顾；染翰<sup>[6]</sup>悽恻，冀式轅□□。□□于洪休，□□名之一刊；庶传芳于万叶。其词曰：

赫矣皇祖，诞膺丕命。非黑在梦，龙輶辅圣。列国于齐，锡封于甯。万古流芳，千龄叶庆。公侯之胤，世挺英灵。或因歌以见志，或假学以知名。崇德象贤，代嗣其职。开府公忠，卿尹亮直。布美化于丹徼，播嘉声于紫极。干蛊之任，迁移钦江。长为茂族，永保家邦。猗显府君，克昭洪烈；桂馥兰芳，冰清玉洁。位以莺迁，阶由鸿渐。去甚去奢，惟恭惟俭。作人伦之圭臬，为躬行之琬琰。悼矣夫人，利有攸往。婚姻六礼，归从百辆。谢玉充庭，帟珠入掌。心方乐于时康，奄并埋于泉壤。泪满礼庐，玉埋灵椁。悲风动林，愁云结阵。痛厚地之易倾，悲

昊天之日，嗟予小子。边士攸宜，笃生贤嗣。维出亲属，克符明义。扫虎狼之穴，得腾蛟之地。爰考宅兆，将迁龙门。马犬效劳，芸庶感恩。圣贤虽戚，悲痛宁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共谢；秋已往兮秋又来，千载之外，尚有余哀。念光阴之电促，孰不身受而心摧。孝为德本，德为义符。胎谋燕翼，垂示楷模。庶历世弥远，而声教愈见覃敷。

[1]据新编《灵山甯氏族志》记载，“据”字应为“璩”字。

[2]据新编《灵山甯氏族志》记载，“巨”字应为“匡”。

[3]“趋”字，据《康熙字典》，为“趋”的异体，故新编《灵山甯氏族志》作“趋”。

[4]“扮榆”，新编《灵山甯氏族志》作“扮榆”，新编《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则作“扮榆”。

[5]“史”字恐误，新编《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则作“吏”，近之。

[6]“翰”字，新编《钦州市志·文物名胜志》、《灵山甯氏族志》均作“翰”字。

## 五、《甯道务墓志铭》跋

林绳武

此志民纪十年（公元1921年）出土于钦江上游距城九十里之平心村。质为陶土，初出地时异常松脆，破为大小十块。村人任意分藏，无人辨别其朝代及人物。十七年（公元1928年），武因总纂县志，遍搜金石，始发现为陶刻。既而汇集块片，合读首尾，始知为甯越郡第五世刺史甯道务墓志铭。

六代以来，百越中以姓名郡者，惟吾钦甯氏为著。然有史传可稽者，惟逵、猛力、长真三世而止，及百年以前，大业翔威石志出土，始知长真有弟曰贇，亦不过等诸猛力有弟曰暄，暄有子曰纯而已。三世而外，迄无可考。自此志出，方知四世曰璩，五世曰道务，皆以刺史世其家。道务以后，还有第六世岐岚、岐菱。诸甯盖陈、隋、唐间。甯越所以名郡者，本以五世刺史，故道务正为钦县开国公曾孙也。较翔威石志，仅属甯家三世旁支小史，其价值殊未可同年而语。吾国数千年碑志著录，未曾有千言以上之陶刻。此志乃达千六百余言，实为空前创见，故翔威不过岭外第一石刻，而道务乃中国第一陶刻也。今国人渐知钦县陶产远迈宜兴，认为我国第一陶苗所在；但无人能知千二百年前，先民有此伟大之制，故

不徒为金石界之环宝，尤为钦陶业不祧之祖也。武因发明钦江为醴水，又证以景德镇瓷釉出于醴陵硅砂，醴水与陶土中有天然关系，钦陶红白两苗，皆在环城醴江东岸，故辟醴江园于江湄，隐于陶以为业。园之中央建楼一幢，颜曰陶志，属茶陵谭组安书榜之，所以重此志之纪念也。

武发现此志之初，曾亲访遗冢，搜求旁证。冢在平心村斜坡上，当年系土人穷百足虫穴而发掘者。由穴斜进冢中，横宽二丈余，直宽亦近二丈，高可六尺许，世所谓逍遥冢式也。四壁皆用长方砖砌立，中间两砖壁，各通圆拱门二；下敷正方砖，皆有席纹同铜铁和泥烧成者，故重量视普通方砖逾两倍，足为当年陶制发达之证。此陶志平卧冢正中方砖面，又可推知道务棺槨还在下层。久拟组织一委员会，从事探掘，以期多所发现殉器；并拟仿制陶志，补置原冢，以存古迹，皆有志未逮也。

按甯氏有三大遗冢，一曰七星坪，二曰平心村，三曰鸡灵石。鸡灵石冢与平心冢大同小异，均视七星坪翔威冢为宏伟。惟鸡灵石冢砖皆赤色，道务冢皆青色。信非五世刺史期间，无此巨筑也。三冢都在江之东，平银江之西，同出大雾山脉，相距各不过三四十里，以是知甯越郡当年之中心地点本在此也。

道务远孙、灵山海如先生，来任钦县法院首席检察官，访武陶志楼。既读拓本，复抚陶刻，惊叹不已。盖祖系之失稽，至无典之可数。得此志后，五世刺史之族谱乃完而不阙。微特甯家一姓之史所在，即甯越一郡之史所籍以补缺憾者，非异物也。适武行篋携有旧藏拓碑南单宣笺。海如索取，命工细拓三张，即属详题如右，将以实其家乘也。

民纪二十有二年癸酉季夏醴江处士林绳武题于西罗浮草堂

(可风按：此碑藏于冯宅。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日寇犯钦，不及移藏，捣碎六分之五。现蔡夏廷处尚存碑尾一角，方横仅一尺许。)

##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1976~1977年，鉴于钦州县久隆、平吉两公社历年来陆续发现不少隋唐时期的文物，我队会同钦州县文化馆在上述两公社范围内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和钻探

工作。在平吉公社的古龙、独竹，久隆公社的新圩青草、新明，高营等地发现古墓葬 30 余座，其中以久隆公社的青草、新明两地最为集中，这些古墓葬，除古龙独竹的墓葬坐落于钦江西岸外，其余均集中分布在钦江以东、新明江以西的大雾岭（亦称大墓岭）东麓。这次调查发现的古墓葬，除极少数外，封土均被夷平。为了防止古墓葬继续遭受破坏，1977 年 6~7 月间，我队会同钦州县文化馆在久隆公社青草大队清理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墓葬 6 座。1981 年 3 月，在新明大队石狗坪老冯岭又清理墓葬 1 座。两次共清理 7 座，现将情况整理简报如后。

参加调查和清理的有我队方一中、韦仁义，钦州县文化馆佟显仁、孔风戈和久隆公社杨家松等同志。

## 一、地理位置

钦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南临北部湾，西接防城，上思，隔海与越南相望，北连邕宁、灵山，东邻灵山、合浦。县城钦州为钦州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位于钦江下游钦州湾沿岸，为我国南疆边陲重镇。久隆位于钦州东北约 18 公里，久隆北连平吉，东部为大雾岭，岭东麓是古墓葬分布聚集的地带。调查资料表明东麓墓葬分围范布，北起隆公社平心，南至新明的石狗坪（亦称七星坪）绵延达 10 公里。

关于这一地带的墓葬，《钦县县志》（1936 年版）曾有记载。“隋正议大夫甯贇墓，在城东三十里石狗坪”，“清道光六年秋，州人耕于石狗坪获此碑，碑额十二字四行，分列于首，下方就书文，文楷书三十行，行三十九字，末际稍损一角”，“清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土人复于石狗坪犁田寻获一角”，“唐刺史甯道务墓，在城东七十里平心圩山麓。是墓发现于民国九年，因有平心村农李士花遇一巨百足虫入斜坡小穴，掘穴发现大冢，冢分前后两座，左右备四室，皆通以圆拱门，用长方扁砖筑成，下铺十字格花纹正方砖。前座方砖面正置陶制墓志碑”，“唐谏议大夫甯原悌墓在城东北三十里大墓山”，“又有甯公墓在县东六十里鸡灵石”，“又再有甯公墓，一在平吉那隆坪，一在平吉独竹岭”。这些记载，说明这一地带的墓葬至迟在清末年间已为人们所注意和被盗毁。

1977 年和 1981 年两次发掘清理的 7 座墓葬均坐落于这些早年发现和被盗毁

的墓葬之间。1977年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在墓葬分布区中段刘屋村的双墩、邱屋村的大沙坡和屯洲村的六坟岭，均属久隆公社青草大队所辖。1981年第二次清理的一座位于墓葬分布区南端新明大队石狗坪老冯岭。墓葬封土多已无存，按发掘先后为序编号。M1、M2相邻，位于刘屋村双墩。双墩之名来自这里有两大土墩，实为两座墓葬的封土。北面一坐早已无存，难以辨认，仅其东侧田埂断面上暴露出五花杂土和零乱的墓砖，清理时编号为M1。M2在M1之南，相距10米，从东侧坡下仰视尚可看到残存的封土。西侧已与地表相平，无封土痕，墓砖零乱散布于地表。M3、M4、M5自成一组，南北成列，在M1、M2北约200米的邱屋村大沙坡东面。除M3尚残存一些封土外，其他两座均无存。M3处于北端，其东侧为阶梯式农田，田埂断面露出散乱的墓砖。M4在M3南43米处，地表已看不到墓葬的痕迹，于25厘米厚的耕土层下有方形墓砖。M5处于M3、M4之间，南距M325米，北距M415米，封土无存，东侧断面露出墓壁。三座墓均东西向。M6在犬沙坡北约2.5公里的六坟岭东麓，北距屯洲村约0.5公里，无封土。六坟岭东麓坡势平缓零星植有松树、茶树，地表看不到墓葬痕迹。M7在M1南约4公里的新明大队石狗坪老冯岭西坡，无封土，灌溉水渠经过墓的后端，其南300米即是甯贇墓。这7座墓葬虽不连在一起，但均处在大雾岭东麓，南有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甯贇墓，北有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甯道务墓，均属东南向，南北成列，墓室形式和随葬品的配置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它们之间似应有一定的关系。

## 二、墓室形制

7座墓葬均为砖室墓，除M2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外，其余6座均较小，结构简单。根据其不同的结构可分为四种形式：

（一）M1。96度。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包括墓门、甬道和墓室三个部分，全长4.9米。甬道宽0.98米、长1.35米、高1.05米。墓室宽1.35米、长3.35米、高1.85米。墓室底部较甬道底部高15厘米，均铺人字形地砖。墓壁砌砖用三平一竖法砌成，双层，券顶。墓门作券拱式，门宽0.6米、高1.1米，墓门券拱上用双层砖砌起一堵拦额，其高度与墓室券顶相当，长与墓室外壁大致相齐。

墓砖以红砖为主，有少数青砖。长方形砖规格为 32 厘米×155 厘米×5 厘米，楔形砖规格为 31.5~4.5 厘米。墓门外有斜坡式墓道，倾斜 14 度，宽 1.04 米，长度因造梯田破坏不详，清理时发现西侧填土有盗洞一处，墓室后部券顶南侧亦有盗洞。墓室前部券顶崩塌：由于被盗扰乱和券顶崩塌，随葬品多破碎，集中于墓室前端及甬道。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次为陶器，未见金银器。器形有青瓷碗、杯、唾壶、钵和四系陶罐、陶钵及琉璃杯等。

(二) M3、M6。前室短而宽，后室作长方形。较前室窄、矮，甬道极短，整个平面呈“中”字形。券顶，墓门均砌有拦额矾拦额。

M3，114 度。前室两侧设壁龛，壁龛及龛头均作“品”字形布局。后室两侧不设壁龛，设有龛头。墓壁砌砖用平砌法，封门砖为一平一竖砌法。墓门外有阶梯式墓道，其长度因造田被破坏而不详。前后室间券顶上有盗洞一处，随葬品严重扰乱，有的被弃于盗洞填土中。随葬品集中于前室北侧，以陶瓷器为主，器形有四系罐、碗、钵等。

M6，102 度。全长 4.68 米，前室长 1.3 米，宽 2.56 米、高约 2.4 米。两侧设有耳室，耳室宽 0.7 米、高 0.94 米、深 0.54 米。后室长 3.4 米、宽 1.1 米、高 1.43 米，墓底较前室高 16 厘米，均铺“人”字形地砖。墓门的宽、高与后室相同，平砌封砖。墓室四壁均以平砌数行竖砌一行的砌法砌成，双层。墓门外有斜坡墓道，倾斜 18 度，墓道两旁用厚 4 厘米，14 厘米×14 厘米×15 厘米或 13 厘米×13 厘米×13 厘米的等腰或等边三角砖各立砌一行，呈锯齿形，长 1.2 米。前室早年已崩塌。随葬品集中葬于前室南侧，铜镜被打破，碎片散布于后室。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有少量铜器。器形有四系陶罐、陶钵、绳纹红陶釜，青瓷碟、瓶、提梁壶，及铜镜、和玉笄等。

(三) M2、M7。结构较复杂。由墓门、前后甬道、前后室等部分组成。后室两侧均设有壁龛。墓室结构平面呈“干”字形。

M2，是两次发掘清理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室结构分墓门、前后甬道、前后室等五部分。前室券顶高于后室和甬道券顶。墓向 96 度。整个墓室全长 7.44 米。前后甬道均长 1.46 米、宽 1 米、高 1.64 米。前室长 0.9 米、宽 2.6 米、高

2.5米。后室为主室，长3.6米、宽1.7米、高1.6米。设有棺床，高出墓底34厘米。三面留有边沟，设有头龕和壁龕。墓底铺人字形地砖。墓门宽1米、高1.1米。墓门外有斜坡墓道，倾斜24度。墓门及墓道之下设有一条排水沟。墓壁及封门砖均为三平一竖法砌成。前后室券顶均发现有盗洞，部分崩塌，说明墓葬多次被盗。陪葬品被劫一空，后室后部散布一些铜器残片、铁器残件及金箔做成的钱币，前室南侧有一堆陶罐碎片。

M7，后甬道不很明显，后室两侧券龕较多，每壁均两行，上行壁龕浅小，均3个，下行壁龕较深较大，北壁5个，南壁4个，上下两行壁龕略呈“品”字形布局。头龕呈“品”字形，上一小龕，下两个大龕。前室两侧壁较宽大，前后壁中部以墓砖相间立砌成竖格式窗棂。后室棺床高于墓底18厘米。墓底铺“人”字形地砖。墓壁平砌，双层，数行间砌有一行莲花纹或叶脉纹砖。前室券顶崩塌，后室券顶有盗洞一处。随葬品被劫空，前室两侧及甬道残存一些漆器残片，棺床中部南侧遗留开元通宝钱九枚。

(四) M4、M5。为夫妇合葬的双室墓。双室平行，大小相等，形式相同，两室间隔墙前部设有券拱式过道相通，墓底作成两级，前级稍低，均铺“人”字形地砖。墓壁以一平一竖或三平一竖法砌成，券顶。东西向。随葬品集中于墓室前端。五号墓，109度，两室均长4.5米、宽1.15米。两室间隔墙前部设有宽0.6米的过道。过道相对的墓壁设有壁龕。墓底前端较后端低34厘米。墓室后壁有“品”字形布局头龕，上层一龕，宽8.0厘米、高60厘米、深20厘米，下层为两个小龕，大小相同，宽32厘米、高34厘米、深10厘米。墓室两侧壁相对各开灯龕3个，备置青瓷碗一只。墓室顶部全部崩塌，从残存后部墓壁可知道墓室顶部为券顶，高约1.4米。墓门宽、高与墓室相同。墓壁砌砖为平砌法，封门砖为一平一竖砌法。墓门外有斜坡墓道，倾斜12度。随葬品集中放置于墓室前端，后部置棺并有随身携带的小件物品，12件生肖铜镜破为两半分置于两室，左室的镜面朝上，右室的镜面朝下。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有少量金属器。器形有四系罐、碗、盂等陶瓷器和铜镜、五铢钱、铁剑、铊刀、铁锅和金发钗等。

这些墓葬，在形式上同广东地区韶关、封川、英德等地的隋唐墓葬有许多共



同之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 三、随葬器物

7座墓葬多数早年被盗，随葬品多被扰乱，由于被盗，墓室顶部崩塌，器物多被压碎。清理出土的随葬品共计130余件（片），以青瓷器为主，有少量金属器、琉璃、玉和漆器等，漆器仅见于十七号墓，已朽，仅见残片，不成形。

（一）青瓷器53件。轮制，灰白胎，较厚重，施有护胎衣。釉厚润，表微泛黄，细开片纹，胎釉结合较显，易脱落。器形主要有碗、碟、钵、杯、瓶、罐、唾壶、提梁壶等。提梁壶造型特殊，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碗37件。是出土瓷器中最多的一种。胎较厚重，外壁施釉不及底，器里有迭烧垫珠痕，小假圈足，分四式。

I式25件。直口厚唇，深腹，圜底，厚胎。釉多不匀，青微泛黄，个别青中微显绛红色，细开片纹。一般口径10.2厘米、高6.5厘米、足径3.8厘米。最大口径13厘米、高6.9厘米、足径5厘米。

II式2件。敞口，深腹，小假圈足，青中微显绛红色。口径13厘米、高7厘米、足径5厘米。

III式2件。口微外撇，薄唇，深腹，胎较薄，口沿下弦纹一周，小假圈足，口径12厘米、高7.7厘米、足径4.1厘米。

IV式8件。均出于一号墓。口微敛，薄唇，浅腹圜底，平足。里心饰蔷薇花等印纹，印纹图案系由多次加印组合而成，故有饰纹重叠弧现象。口径12.5厘米、高4.4厘米、底径5厘米。

碟7件。均出于六号墓。敞口，浅腹，平底。胎较薄，灰白色。施釉较薄，青黄色外壁施釉不及底。里心迭烧垫珠痕。口径10.7厘米至3.2厘米、底径5厘米至5.5厘米。

杯3件。深腹，圜底，小圈足。一种较小，口微敛，口6.8厘米、高5.8厘米、足径3厘米；另一种较大，敞口，口径8.8厘米、高4.6厘米、足径3.3厘米。

钵1件。口微敛，深腹，平底，小假圈足。胎较薄，灰白色。口径15.6厘

米、高 9.6 厘米、足径 5.8 厘米。

唾壶 1 件。小浅盘口，束颈斜肩，扁圆腹。宽假圈足，釉肥厚莹润，细开片纹，易脱落。盘口口径 8 厘米、通高 12.8 厘米、足径 7 厘米。

提梁壶 1 件，圆腹，平底，半环形提梁。提梁一侧肩上海开两个小孔，另一侧肩上海作直口短流，流内作箎。通体施釉，胎灰白。釉已全部脱落。通高 21.4 厘米、腹径 15 厘米、底径 12.5 厘米。

罐 1 件。口微张，短颈，圆腹，平底。肩上海置有四耳，饰组合弦纹四组。最大腹径在腹上部。口径 11.5 厘米、高 14 厘米、腹径 17 厘米、底径 10 厘米。

瓶 2 件，口微张，短颈，广肩，圆腹，腹下呈束腰形，平底。外壁上部施釉，下部露灰白胎。口径 5.8 厘米、高 10.5 厘米、腹径 9.5 厘米、底径 5.6 厘米。

(二) 陶器 41 件。多数为青灰色硬陶，火候较高，少数为软质红陶，火候低，出土时有的早已破碎，未破碎的亦难以移动提取。器形有罐、四系耀、钵、釜、带盖小盂等。

罐 1 件。口微张，直颈，扁圆腹，无系，平底。青灰色，火候较高。口径 12 厘米、腹径 17 厘米、底径 13.2 厘米、高 13 厘米。

四系罐 28 件。这类陶罐出土较多，在陶器中占第一位，分六式：

I 式 3 件。直口，广肩，平底，最大腹径在腹上部。肩上海四耳，并饰组合弦纹四组。口径 19 厘米、高 28 厘米，最大腹径 31.5 厘米、底径 21 厘米。

II 式 5 件。广口，折沿，短颈，斜肩，身瘦长，平底。肩上海四扁耳，并饰弦纹或弦纹水波纹等组合划纹。有的口沿及扁耳上海饰八字形印纹。最大口径 36 厘米、高 52.5 厘米、腹径 44 厘米、底径 25 厘米。小的口径 8 厘米、高 10.5 厘米、腹径 10.2 厘米。

III 式 9 件。与 II 式相似。广口外撇。小的口径 8.5 厘米、高 11.5 厘米、腹径 10.5 厘米、底径 7.5 厘米。大的口径 23 厘米、高 32 厘米、腹径 28 厘米、底径 18 厘米。

IV 式 5 件。小口，翻唇，短颈，圆腹，平底，有的带盖。肩上海饰水波纹弦纹组合划纹。带盖的通高 38 厘米、口径 17 厘米、腹径 38 厘米、底径 21 厘米。

V式5件。唇外翻，短颈，椭圆腹，平底。肩上四耳，并饰弦纹或弦纹水波纹组合划纹。口径15厘米、高23.2厘米、腹径23.6厘米、底径15.2厘米。小的口径11厘米、高1.1厘米、腹径15.6厘米、底径9.8厘米。

VI式1件。敛口，无颈，圆唇，广肩，最大腹径在腹上部，器身瘦长，平底。胎厚重，灰白色，火候低。口径20厘米、腹径40厘米、高45厘米、底径20厘米。

带盖小盂8件。敞口，短颈、扁圆腹，腹下收缩成平底。盖沿微上翘，顶作长圆锥形。红陶、火候低。通高11厘米、腹径7厘米、底径4.5厘米。

釜1件。大沿口，束颈，斜肩，圆腹，平底，腹外壁饰绳纹。红陶、火候低。口径20厘米、高20厘米、腹径22厘米、底径15厘米。

钵3件。敞口或敛口，平底，有的外壁有四扁形耳。青灰色。口径一般为25厘米、高5.2厘米、底径19厘米。

(三)铜器21件。有铜镜、铜钵、铜盒、铜杯等。盒、杯器壁极薄，腐碎不能成形。

镜3件。胎体较薄、均破碎。分二式：

I式1件。圆形，径23.4厘米，半圆镜钮，内区饰云气狮虎等瑞兽、八卦纹，外区饰十二生肖纹，镜缘为铭带，楷书铭文：“淮南起照，仁寿传名，琢玉斯表，镕金勒成，时雍炎晋，节茂朱明，援莫鉴澈，用拟流清，光无影满，叶不枯荣、图口览质，千载为贞。”镜虽破为两大片，但镜面仍光耀可鉴，有较高的铸造工艺水平。

II式2件。圆形，半圆镜钮，素缘，内区饰异兽纹。径分别为12.5厘米、14.5厘米。

钵1件。敞口，方唇。圆底，薄，呈翠绿色，口径16.8厘米、高5厘米。

杯1件。敞口，高足，里心微隆起，有圆形铆钉一颗，壁极薄，破碎。口径10.6厘米、通高9厘米、足径5.5厘米。

盒1件。极薄，破碎残缺不能成形。

残器1件。出于二号墓，长32厘米。

金器 8 件。有发钗、明器金箔币。

发钗 3 件。打制而成。两件较短小，长 7.4 厘米，较大一件长 11 厘米。

金箔明币 5 枚。金箔剪成，状如钱币，无周廓。径 2.2 厘米。似纯属明器。

(四) 铁器 7 件。均为残件，腐蚀严重，可辨认的器形有刀、剑、锅、棺钉等。铁刀，单刃尖峰，残长 48 厘米、宽 4 厘米。铁剑残长 65 厘米、宽 4 厘米。锅已不能成形。

#### (五) 其他

琉璃杯 1 件。直口微敛，深腹，圆底，高足，壁薄，破碎，呈青绿色。口径 7.5 厘米、通高 8 厘米、足径 3.8 厘米。

玉笄 1 件。出于六号墓，残长 3 厘米。

此外，七号墓出开元通宝钱九枚，径 2.4 厘米；五号墓出五铢钱五枚，面背肉好均有周廓，从形制看为隋五铢，因侵蚀严重均破碎。

## 四、结语

钦州地处我国南疆边陲，秦始皇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时属象郡地。秦亡，赵佗行南海尉事，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钦州属赵佗南越国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平南越，以南越故地分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玉林、合浦等九都，钦州属合浦郡地。吴、晋因之。南朝宋、齐属交州、越州宋寿郡地，梁以宋寿、宋广、安京三郡置安州，为钦州有制之始，陈因之。隋开皇年间改安州为钦州，大业初又改钦州为甯越郡，治钦江，领钦江、安京、内亭、南宾、遵化，安海等六县（均属今钦州、灵山、防城等县地）。唐武德初，改甯越郡为钦州总管府。其后，或曰都督府或曰郡或曰州，名虽有所更改，但作为一个行政区域从南朝梁天监四年置安州沿至今日，一直是我国南疆边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甯越郡故址在今久隆北面的上东霸村，故址犹存，城北之东即为大雾岭东麓墓地，所以，墓地应与甯越郡密切相关，是甯越首领甯氏家族的墓地。所清理的七座墓葬处于整个墓地的中段，较靠近甯贇墓，远离甯道务墓。因此，这七座墓葬的年代应与甯贇墓相距不远。

七座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的配置及其风格等方面都带有较浓厚的南朝作

风：墓葬形制是流行的“凸”字形或其变形的砖室墓，三平一竖的砌砖方法及墓底铺“人”字形地砖，随葬品以青瓷器、陶器为主，盛行四系陶罐，青瓷碗、杯等器形，胎体厚重，敞口，小假圈足，釉肥厚青中泛黄，细开片纹，易脱落，施托胎衣等，都带有明显的南朝作风。但墓室多设置壁龛、灯龛、排水沟等又具有隋、初唐时期墓葬的特点。M1出土的IV式青瓷碗，其造型、纹饰均与广东韶关河西隋墓出土的I式印花碗<sup>[1]</sup>、广东封川隋墓出土的同类碗<sup>[2]</sup>、江西清江隋墓出土的印花青瓷钵完全<sup>[3]</sup>一样，墓室形制和随葬品的配置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M1的年代应与上述广东、江西等墓的年代相当，为隋大业后期或初唐的墓葬。M4、M5为夫妇合葬墓，其形制与广东英德光镇隋至初唐基本相同，且M5出土有隋五铢钱和十二生肖铜镜，因此，它们的年代亦应为隋至初唐时期的墓葬。M3与M4、M8为邻，其年代亦当与M5相近。M7出土开元通宝钱，钱轮廓整齐，字文端正清晰，较中唐所铸开元通宝精致，应是初唐武德年间所铸。同时墓室设置多壁龛，使用莲花纹，叶脉纹墓砖，说明此墓应是具有南朝遗风的初唐时期的墓葬，M2与M1相邻，其年代亦应与M1相差不远。

总之，这七座墓葬彼此之间虽有一些差异，但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配置等方面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它们都应是隋至唐时期甯氏家族的墓葬。

《旧唐书·地理志》载贵州郁平县（今玉林县地）为“古西瓯、骆越所居”，指出今玉林、贵港一带是古代西瓯和骆越杂处的地区。明区大任《百越先贤志》、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进一步指出，“牂牁西下，邕、雍，绥，建，古骆越也”，“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钦州正地处古代骆越聚居地之内。一般认为古代百越中的骆越人约在战国秦汉时期，在这个区域内生息繁衍了数个世纪。东汉时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乌浒，乌浒人在这个区域亦生活了数个世纪，到了南朝时期史书逐渐不见记载，而出现了俚人，史书中找不到这个区域民族大迁徙的痕迹，因此，骆越、乌浒、俚应是具有血亲关系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太平寰宇记》：“贵州（今贵港）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南朝末至隋唐时期是俚人发展全盛的时期。钦州甯氏正是这个时期岭南俚族势力最大的土豪之一。他们“家声阀阅”，“世为南海以西溪洞之俚帅”。

据清道光六年（公元 1826 年）出土的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甯越郡钦江县正仪大夫甯贇墓志载：其祖甯逵，南朝梁武帝时除定州刺史（今玉林一石南）总督九州诸军事，陈时授安川刺史。父甯猛力为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兄甯长真“帝授上仪同三司钦刺史，立功于国赐加官尝寻进上开府仪同三司，钦江县开国公……转上大将军……右光禄大夫甯越郡太守”。而甯贇“授大都督”，“上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正仪大夫”。甯贇墓志所载，与《北史·令狐熙传》《隋书·何稠传》《唐书·南蛮传》等史籍关于陈隋唐间钦州甯氏“相承为豪”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并补充了上述史籍记载的不足。民国九年（公元 1930 年）出土的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唐刺史甯道务墓志，表明甯道务是甯璩之子，甯长真之孙。这就把自南朝梁开始的“代承衣锦之荣”“相承为豪”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甯氏家族延续至开元年间的中唐时期，填补了史籍之所缺。据墓志载，甯道务先后任中襄州临漳令、龙州爱州司马、玉林牧、新州封州刺史等职。其长子甯岐岚任桂州始安主簿，仲子岐茈荔浦丞。<sup>[4]</sup>此外，据《唐书·南蛮传》载，其家族中，南朝陈祯明间甯猛力袭安州刺史时，其胞弟甯暄治大廉洞，入隋任合浦太守。唐初，甯暄死，子甯纯任廉州刺史，后迁合州刺史。甯纯从孙甯原悌为唐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另一族人甯道明任南越州刺史。墓志和史书所载，表明甯氏家族世代是俚人的首领，为陈隋唐时期岭南地区势力最大的土豪之一，他们与高凉的冯氏家族势当力敌称雄岭南，左右着岭南地区的局势。

甯贇及甯道务墓志均载其祖为冀州临淄人。先祖入居蛮越，盘根岭南，“宣扬国化”，“抚甯蕃部。“德隆蕃邸”而世为俚帅。他们在传播汉族先进文化，促进汉族与俚人的融合方面曾起了重要的作用。甯氏家族自南朝后期直至中唐，一直是岭南地区势力最大的土豪之一。中唐后，从甯道务父子的任职表明，他们已经逐渐远离了世袭领地。

唐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甯原悌举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谏议大夫一事，表明初唐后期钦州甯氏家族的世袭特权随着唐王朝中央势力的强化和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控制的加强已在逐步丧失，能世袭的已经越来越少，中唐以后，

史书中就很少再见到甯氏活动的踪迹了。

(原载《考古》1984年3期,执笔者韦仁义、佟显仁。)

[1]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5期。

[2]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封开县江口汉墓及封川隋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文物资料丛刊》1979年第1期。

[3]清江博物馆:《江西清江隋墓》,《考古》1977年第2期。

[4]民国《钦县县志·艺文志》。

## 七、广西钦州俚僚酋帅甯氏家族研究

郑超雄

自南朝梁武帝迄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两个世纪内,广西钦州俚僚酋帅甯氏家族与广东高州冯氏家族一样,都是岭南声威显赫的少数民族首领。甯氏家族以钦州为基地,在其势力鼎盛的隋唐时期,辖区东达郁林、白州(博白县),西有西原(扶绥县地),南拥大海,北至邕州(南宁市),包括今天的玉林、博白、灵山、钦州、合浦、浦北、防城、上思、扶绥、大新、崇左等县市。不仅如此,甯氏家族内的一些成员曾率数千俚僚部兵跟着隋军南征林邑,北伐高丽,可见其实力颇受当时的中央王朝重视。甯氏家族长治桂南地区,在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以及开拓广西南部沿海地区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故研究甯氏家族的兴衰史,对了解古代广西的地方史和民族史无疑是有益的。

甯氏家族的研究,前人曾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是零碎的,因而不能系统地反映出甯氏家族的全部历史面貌。我们认为,只有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紧密结合,才能比较系统地地理出甯氏家族的历史脉络来。关于甯氏家族的史料,清末以来,多有发现。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在今钦州县久隆公社新明大队石狗坪,发现了隋朝甯越郡钦州县正义大夫墓志碑一方,系甯氏族入甯贇墓内所出。碑(碑现存广东省博物馆内)属石质,铭文分三十行,每行三十九字;出土时损伤十三字。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在钦州平吉公社平心村后背山山冈又发现唐朝钦州刺史甯道务墓志碑一方。碑系陶质。出土时碎为十片,

后经人修复方能断读拓印。铭文分三十行，每行有四十个字至五十个字。惜碑在1939年为被日本飞机炸毁，现仅存六分之一（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内）。1977年和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分别在钦州久隆公社的新明大队、草青大队两地发掘了七座甯氏族人的墓葬，共出土文物一百三十多件。这两方墓碑及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甯氏家族的兴衰提供了史籍阙如的实物资料。另外，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钦州境内的隋唐古城址进行过勘察，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本节就依据这些地下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甯氏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讨。

### 一、甯氏家族的祖籍及族属

关于甯氏家族的始祖，史文无载。据甯贇墓志铭文载：“祖逵……梁武皇帝除定州（今广西贵港市）刺史，总督九州军事。陈宣武帝又陈授安州（今钦州）刺史。”如墓志所载，甯逵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甯氏家族最早的先祖，可能也是甯氏家族在钦州立脚创业的第一人。甯逵从什么地方来到定州任刺史而后再转任安州刺史呢？

《新唐书·南平獠传》说：“南平獠，东距智州（今广西玉林），南属渝州（今四川巴县），西接南州（今四川綦江县），北涪州（今四川涪陵县）。……有甯氏者，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甯越太守。”“南平”，史文所指地望，正如《中国地名大字典》所说：“故治在今四川巴县东南”，位于今四川省巴县一带。然而上述引文的“南平獠”“东距智州”似为作者误笔。因唐时称名“智州”者举国唯今广西玉林，广西玉林与四川巴县中隔着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何以唐“南平”一州竟跨数千里之遥？且唐代这些地方都设有州县，“南平”一州不得而囊括川、鄂、湘、黔诸省之州县。何况，文指“东距”，广西玉林非四川巴县之正东，南平何以得而“东距”智州，此文非误而何？如此，则《新唐书》所说的甯氏家族原来是四川南平一地少数民族世袭酋帅，就值得怀疑了。

《新唐书》叙述南平獠的风俗时说：“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妇人横布二幅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后，竹筒三寸，斜穿耳，贵者饰以珠钗。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货求男；贫者无



以嫁，则卖为婢。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其王朱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纳款以其地隶渝州。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颈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又有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这条史料记载比较混乱，作者方域不明，人群不分，将住在四川巴县的“南平獠”和住在广西的“乌武獠”混杂一处，统称是居住在四川南平地区的少数民族。《资治通鉴》卷五十七载：“灵帝二年(170年)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胡三省注说：‘乌浒之地，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贤曰：乌浒，南方夷号也。’……刘恂曰：‘贵州郁平县(广西玉林市)，汉郁林、广郁县也。古西瓯、骆越所居也。谷永招降乌浒，开置七县即此也。’”同书又载：“光和三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反，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这些记载说明乌浒獠都是活动在广西东南沿海地带，而史上也从未发现有关乌浒獠在四川南平活动的记载，这是第一。

第二，《甯贇墓志铭》文中说甯逵最早是在定州任刺史，以后又改任安州刺史，没有谈及他或者更早的甯氏家族先祖曾在南平任职或者居住过。在那高其出身、讲究阀阅的时代，这不是偶然的遗漏，而是事实上甯氏家族没有在南平活动过。《新唐书·南平獠传》说：“陈末以其帅猛力为甯越太守。”甯越即甯越郡(今广西钦州)，陈时，甯氏已在广西钦州为官，成为当地世袭土酋，怎又离土到四川南平去做官？《新唐书·西原獠传》说：“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继为豪。”按文中所载甯氏家族居住地域正好是今日广西钦州以西直至左右江流域一带地区，与甯逵、甯猛力父子刺史一职辖区正相符合。如此则可判定甯氏家族不是“世为南平渠帅”，应改为“世为乌浒獠渠帅”。《新唐书》作者误甯氏家族世为南平渠帅可能是四川“獠”与广西“獠”名同俗同所致。

关于甯氏家族的族属问题，除《新唐书》的作者认为他们是“獠”人外，有称他们为越人的<sup>[1]</sup>，有称他们为俚人的<sup>[2]</sup>。甯氏家族并非地道的少数民族，而是高度越化了的汉人。其实，“俚”“獠”“越”名殊实同，都是“越”系土著，只是不同时代不同称谓罢了。然据《甯贇墓志铭》铭文说：“公讳贇，字矜威、冀州临淄(山东临淄县)人也。”《甯道务墓志铭》中也说：“府君讳道务，字惟清，

临淄人也。于甯氏之族，肇自太公……克甯东土……国于齐壤，列封于甯城，祇台德先，因而命氏。”甯贇是甯逵的孙子，甯道务是甯逵的第四代曾孙。两人墓志铭文中皆说祖籍山东临淄，是为汉族无疑。但是，以上墓志铭文中所说的甯氏先祖系山东冀州临淄一事，是否真实，我们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必要。因为历代广西土司酋帅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望门第，多有拉祖配的习俗。<sup>[3]</sup>如桂西岑姓土司就说他们的第一代始祖是岑仲淑，并说岑仲淑是浙江余姚人，中过进士，随狄青来广西征讨侬智高，平息后留任邕州知州，据考证其实是拉祖配；又有韦姓的壮人，也说自己是韩信的后裔，因韩信获罪被杀，其后人惧怕株连，避居广西，将韩字去掉半边，改成韦姓。<sup>[4]</sup>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那么，甯氏家族是否也是和上述情况一样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下述几方面来证明甯氏祖籍是山东人的可能性。

1. 但凡广西少数民族拉祖配之风，是宋时始有，盛行于明清，我们现在看到有关拉祖配的材料基本都是明清文人所记，而唐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有关拉祖配方面的资料。《甯贇墓志铭》是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所制，其言可信。

2. 甯氏家族所处时期，在各少数民族首领中文化水准最高，素有优良的家学学风，历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像甯原悌于武后时策对，中进士第九名，并留京师修国史，这在当时是全国有数的高级知识分子。甯氏家族这样高的汉文水平，无疑与他们来自山东文化之乡有密切的联系。

3. 从考古材料分析：甯氏家族的墓葬形式都是斜坡式砖室墓，墓室分前室后室，一般都设有甬道，墓室两侧设有壁龛，这些特点都是同时代汉族墓葬所盛行的墓葬形式。另外，出土器物中，大部分的器物特点都是同类汉人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雷同，像唾壶这种汉族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所必备之物，在甯氏族人墓葬中多有发现。虽然出土器物中有些器物具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没有发现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器物存在。这些情况说明甯氏族人在生前都惯行汉人的生活习俗。这或者正是他们的族籍是汉人所决定。

以上三方面材料说明，甯贇及甯道务两方墓志碑所载他们的祖籍系山东临淄

汉人，是值得相信的。甯氏家族先祖是怎样从山东来到广西的呢？史书无载，我们只能从甯贇的墓志铭文中窥知一二。甯贇墓志中说：“窃以太宰之末，分颍臯（贇）之邦。唐叔之余，为管鲁之国。邵公恩室，赋棠棣之诗。辛有哀本，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自结贞筠之条。宗子维城，各理封疆之邑。”甯氏先祖在山东时为“邵公恩室，赋棠棣之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贵族之家。这样的人家为什么来到广西蛮荒之地呢？“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一个悲字就足以证明他们来到“被发文身”的少数民族之乡，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某种政治的原因。《读史方輿记要·济南府》：“青州之域，春秋战国并属齐，秦属齐郡……刘宋兼置冀州，后魏改为齐州。”甯贇碑文中说其“冀州临淄人”。我们知道，冀州原来是刘宋设置的州，后被北魏吞并，改为齐州，而原属刘宋时期所封的官员，便随刘宋朝廷南下，估计甯氏家族祖先也是这个时候南下江南投靠南方小朝廷的，故有“悲被发之异”形容其亡国亡地之悲惨情况。北方许多文人武将南迁投靠南方小朝廷之后，往往被南方小朝廷分派去治理那些比较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如广东高州的冯氏家族，其先祖原是北燕皇族，后国败，燕昭成帝冯弘奔走高丽，于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派“族人冯业（即后来高州冯氏家族始祖）以三百人浮海奔宋”[5]，南朝刘宋朝廷派遣冯业到广东罗州（今广东化州）任刺史：以后冯氏与当地土著酋帅冼氏联婚，据有高州一带地方，成为岭南很有影响力的地方势力。广西甯氏家族所辖地与广东高州冯氏家族辖地毗邻，一在东一在西，两家关系密切，如甯逵的第四代孙子甯璩即娶高州冯氏女作妻子，结了秦晋之好。依据这些迹象，我们完全可以推论说甯氏家族先祖亦当是在刘宋时期来到广西的。

## 二、甯氏家族的兴盛时期

甯氏家族势力在岭南的兴盛时期，是甯猛力和甯长真两代人在世之时，时间约从陈末至唐初武德年间。而甯逵在世时为甯氏家族在钦州创业时期，此时其势力仅限在钦州境内。陈末甯逵死去，其子甯猛力袭刺史职。《甯贇墓志铭》说：“父，猛力，（隋）文皇帝除使持节开府同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但是，《新唐书》却说“陈末，以其帅猛力为甯越郡太守”，与碑

文略有出入。《隋书·地理志》：“钦江，旧为宋寿郡。平陈后，郡废。开皇十八年，改为钦江，大业初置甯越郡。”甯猛力是开皇十七年十月死的<sup>[6]</sup>，其时还没有甯越郡，而《新唐书》却说他曾任甯越郡太守一职是不符合史实的。因此，甯贇和甯道务的两方墓碑铭文中均未提及甯猛力曾任甯越郡太守一职。《新唐书》作史者为什么说甯猛力曾任甯越郡太守呢？估计是作史者以后之郡县概念附会到甯猛力的身上所致。

甯猛力是甯氏家族中最有作为的人物，南北朝时，其在岭南政坛影响颇大。甯猛力在陈末承袭父职安州刺史之后，日筹夜思的一点就是如何拓展辖区扩大范围。陈后主祯明年间（公元587~公元589年）猛力派遣他的弟弟甯暄带兵进驻合浦大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扼住东南沿海。当时合浦大廉洞一带居住着俚僚人民，由于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尚未编户入籍，甯暄便利用这一历史空隙，威逼利诱，迫使他们成为属下之民。后来陈灭隋兴，隋王朝悉获他已在合浦一带拥兵自重，便任他为合浦太守。隋灭唐兴，唐王朝亦仍任他为合浦太守，继续掌管合浦地方军政事务。武德初，甯暄死，子甯纯袭父职。甯纯和他父亲一样，继续对少数民族做怀柔工作，以扩大势力。“（甯）纯善抚众，招来蔡龙洞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sup>[7]</sup>。”甯暄父子在合浦大廉洞站稳脚跟，甯猛力自己则亲自率军向钦州西部开辟新区，拓展地盘，扩大势力。

当时钦州以西的广大地方尚未设有具体州县，统称“蛮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直至今日，那里仍然是壮族人民聚居地。隋唐以前，那里有黄姓、侬姓、韦姓等大族，每族都有自己的军事首领；以酋长为主，全族人组成能攻善守的武装部族。这种部族平时耕耘种地，若有战事则人人参战。显然，甯猛力如果仅是用武力征服他们是很困难的。他对待那里的少数民族是诚心相待，说服为主。《甯贇墓志铭》说他“與礼政事”，实非饰词。由于甯猛力在少数民族中“與礼政事”，他与各族人民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新唐书》载：“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继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今广西扶绥县境），其隶也。”西原地方很宽，据胡三省说“西原蛮……其地西接南诏……北接道州、武岗（湖南南部），依阻峒穴，绵地数千里。<sup>[8]</sup>”这样广大地区的人都臣服于甯猛

力，不听从中央王朝的指令，这是甯猛力自己去做工作取得的，它说明甯猛力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方法是正确的。但是甯猛力在陈末隋初时的势力是否达到“西接南诏，北接道州、武岗”这样宽的地域呢，尚有讨论的必要。在史籍中以及甯赞、甯道务的碑文里，我们还未发现甯猛力的足迹曾达到以上地方的记载，就是民间传说中，我们足遍滇桂、湘桂交界各地，也从未听到有关的传说。据此推论，西原蛮臣服于甯猛力时仅是指他们早期活动的地域。西原蛮早期活动的地域是以广西扶绥县为中心，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上思、崇左、扶绥、龙州、天等、靖西一带。到了唐至德年间，西原人民起义，其势力才扩展到与南诏、道州、武岗交接的地方。其时，甯氏家族已衰落了。因此，臣服于甯猛力的西原蛮，或仅指其在钦州以西的大新县周围县地。西原地区隶属甯猛力后，甯氏家族在有隋一代就拥有西至扶绥、北接南宁、东至博白县、南有北部湾这样东西千余里，南北五百余里，有山、有海、有平原的广大地域，成为岭南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

尽管甯猛力拥有如此雄厚的地方势力，但甯猛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他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的，在广西各酋帅中起了带头的作用。但是，《隋书·令狐熙传》却说：“时有甯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时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已据有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傲，恃其险阻，未尝参谒。”《隋书》作史者对甯猛力的这种评价，不甚公允。隋初甯猛力为什么“恃其险阻，未尝参谒”呢？这里有多种政治原因。首先，隋初建国，甯猛力等岭南酋帅因地处僻壤，对隋王朝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盲目崇拜；其次是隋初，凡朝廷派遣到岭南任职的行政长官多系贪鄙之徒，当时酋帅稍有反感，动辄以兵威相压，甯猛力自然不会俯首听命。然而一旦朝廷派来清廉之官，以诚相待，甯猛力随即顺理臣服。《令狐传》载：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朝廷遣派老成持重、为官清廉的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立刻得到以甯猛力为首的酋帅们的拥护，亲自跑到桂州总管府参谒令狐熙，诚心表示服从中央王朝的领导。《隋书·何稠传》也说，开皇末年，隋朝廷遣派何稠率军平息桂州俚帅李光仕的反叛，甯猛力不顾身患笃疾，要求与何稠一同进京朝见隋文帝，以表示自己和隋中央朝廷决无二心。当时何稠考虑到甯猛力重病在身，

不宜远路，遂与他约定“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何稠于是年年初先回京师，向隋文帝汇报了甯猛力欲随同进京师朝见之事。隋文帝对何稠不带甯猛力一同回京师很不高兴。殊不知甯猛力于是年十月病亡，隋文帝获悉后感到痛惜，他抱怨地对何稠说：“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何稠很有把握地对隋文帝说：“他死了，他的儿子一定来！”果然不出何稠所料，其子甯长真如言上朝，隋文帝见了非常高兴地赞扬何稠说：“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这两件事表明甯猛力并非是顽固的闹独立的少数民族酋帅，而是顾大体、识大局的酋帅。

甯猛力在世时，在对内方面，他政绩显著，对外方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他带领部兵与隋王朝军队正面交锋的记载，而与周围的酋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正因为如此，辖区内的人们得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当地人民尊之若神明。宋人评论他说：“猛力最有功于钦，钦人即其墓室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数顷，诸甯掌之，至今尚存。”凡以后北来官员到钦州任职也都很钦佩甯猛力的政绩：“太守到任谒之，雨阳不时祷之辄应。”<sup>[9]</sup>

甯猛力死后，其子甯长真袭职。甯长真与甯猛力一样有作为。其才干在某些方面要超过他的父亲。据甯贇墓志说：“南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隋至初唐，甯长真颇受中央王朝重用，从而使他的声名威震岭南，在全国朝野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甯长真自袭父职之日起，就过着戎马生活。先是于仁寿末年随欢州道（越南义安）总管大将军剑方攻打林邑（越南南部）。在恶劣不利的战斗环境里，据墓志说甯长真“困兽犹斗，铺舟新庸之江，出寇绝缘之海。贼牖千乘，公舟二十，旭旦帜交，深霄未止。公策运在标，拥以楼船五鹢，编师檄队，得溃彼豺狼。”征林邑之战的获胜而返，甯长真居于首功。

从林邑回来后，正值隋炀帝发动征伐高丽的战争。甯长真“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sup>[10]</sup>隋炀帝分别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三度对高丽用兵。甯长真随哪一次出征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业七年，下诏讨高丽……诏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今北京市）。又发江淮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镦三万人（胡三省注：镦，七乱反，小也）。”据此，则甯长

真当是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从征高丽的战争。甯长真这次率部从征高丽的情况如何，史书无载，但可以肯定，在隋炀帝心目中认为甯长真所部是一支劲旅，颇为赏识。《隋书》说战争之后，“炀帝诏（甯长真）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土酋蛮帅而除授此中央勋位，可见隋时甯氏家族于当时是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 三、甯氏家族的衰落

甯氏家族趁中原南北之分，中央王朝无暇南顾之机，崛起于岭南，鼎盛于甯猛力、甯长真父子二人。然而随着岭南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与中原交往的密切，甯氏家族作为一方的割据势力，已日见衰落。此中征兆，已见于甯长真的交州征丘和之役；到唐初的参与反唐叛乱，则已标志着甯氏家族日没西山，往日之炎炎赫赫一去不复返了。

隋末，肖铣据有岭南，甯长真归附于肖铣。当时隋朝旧臣，交趾郡太守丘和不肯归附，肖铣即派遣甯长真率本部越兵从钦州湾渡海进攻丘和。这一役长真仅以身免，丘和尽俘其众。<sup>[11]</sup>

唐初，李靖率军进军岭南，平息肖铣的割据战争，甯长真起兵配合，并占有原肖铣辖区郡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战争结束，甯长真派子弟谒见李靖，归顺唐王朝。唐高祖委任甯长真为钦州都督，其族侄子甯纯为廉州刺史，甯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广西东南沿海一带仍然囊括在甯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这或可算是甯氏家族势力的膨大时期。然而甯氏想维护其割据势力，是与唐王朝的大统一相矛盾的。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甯道明凭据南越州并联合高州酋帅冯暄、谈殿反叛唐朝廷。甯长真和甯纯出兵镇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甯道明为州人所杀，甯长真也在同年死去，时年六十岁左右。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说：“长真死，子据袭刺史。”这是误载。《新唐书·地理志》明说，唐武德四年，平肖铣后，改甯越郡为钦州总管府，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甯长真任都督，无刺史一职。《甯道务墓志》载“祖，长真，隋光禄大夫胪卿，皇朝钦州都督上柱国开国公”，此正与《唐书·地理志》所载相符。如果说甯璩袭父职，那么也当任都督，但是在甯道务碑文中并没有提及甯

璩任都督一职，甚至说甯璩没有职务。何况甯长真是在此时期死去的，碑文不说，即足说明《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所载之误。

实际上，自甯长真死了以后，唐王朝强化了在钦州的统治地地位。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将钦州分置越州，不久又改属廉州，罢钦州都督府。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以钦州旧都督府所辖之地隶属容州。到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钦州，统县五：钦江、保京、内亭、莲化、灵山，属邕州都督府管辖。这时候唐王朝多从别地派官员到钦州任职，一改以往甯氏家族一统钦州的世袭旧规，大凡甯氏家族中能胜任官职者，都调到别地任职。而且是从小官做起，并非一上任就得刺史职。像甯璩子甯道务，先是任襄州临漳县（今广西上思县，当时属小县）令，万岁通天（唐武后公元696~公元697年）调补龙州司马（广西龙州），以后屡任爱州司马、爱州牧等职；他任职的地方都不在钦州境内。又甯道务的长子甯岐岚在甯道务死后也不得袭职，只是担任像桂州始安主簿的小官，而其地也同样不在钦州境内。这是唐王朝限制防止甯氏家族搞地方割据的一种有力措施。尽管这样，由于甯氏家族世据钦州地区，树大根多，仍不失为钦州一地的地方豪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记载：“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清平公李宏节遣钦州首领甯师宋（《旧唐书》作甯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襄州（今上思县）”。《旧唐书》卷四十一亦有同样的记载。看来唐朝为了巩固自己在岭南这一边远地区的统治，还利用甯氏后人。直至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以后这样的局面才起了彻底的变化。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载：“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甯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之入海。仁轨追杀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唐中宗为什么派周仁轨来剿杀甯氏族呢？原来韦玄贞是韦皇后的父亲。“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传于乾元殿……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无罪？’”唐中



宗废为庐陵王之后，韦玄贞一家也被武则天流放钦州。对于这位被流放的皇亲国戚，甯氏家族子弟依然平日所作所为，视若平民百姓，为霸为恶，杀人妻，夺人女。可见甯氏家族的子弟仗势欺人，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此瘤不割，此恶不除，何以维护唐的大一统？二十四年以后，唐中宗复位，韦皇后依旧做皇后。为了替韦皇后报母仇，唐中宗指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二万军兵来钦州剿杀甯氏族人。这件事的发生也说明，在此之前甯氏家族的武装部兵实力仍然很雄厚，一般的地方官是奈何不了他们的，否则周仁轨怎么会动用两万官兵来讨伐呢？这次讨伐，“杀掠其部众殆尽”，甯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捕杀，从此家道衰落，销声匿迹于史书。

甯氏家族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来隶属于其统治的西原地区，由于本身社会经济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许多强大的集团势力，纷纷脱离了他们的羁縻。《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又逐韦氏、周氏于江滨。县地数千里。”从文中我们发现天宝以后黄氏强大，击败韦氏、周氏至海滨。天宝以后西原地区壮族人民暴发了震动唐王朝的大起义。起义之初，他们攻击的目标都是钦州地区的州县。以后才逐渐扩大到广西北部直至湖南南部。据史书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49年）四月“钦州蛮黄少卿反，围州城”。七月“黄少卿陷钦、横（横县）、浔（桂平）、贵（贵县南）等州”。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七月，“黄洞蛮破钦州千余镇”。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对于西原壮族人民的起义，唐王朝束手无策。此时，甯氏家族已是强弩之末，难以控制局面了。一代酋帅势若黄昏落日，欲想东山再起，此时已不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进步的标志。

#### 四、甯氏家族兴盛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自南朝历隋至唐初，钦州一地属甯氏家族辖区，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能在这个地区推行；辖区之内，甯氏世代口含宪章，手握予夺之权，其喜怒哀乐，足关人命。《隋书·食货志》载：“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其军国所需杂物，随土而

出，临时折课帛收，乃无恒定法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这就道出了中央王朝与甯氏家族的关系，仅是进贡方物土产这一层关系和名义上的臣服罢了，而其治下各州县的政绩如何，朝廷是不能过问的。下面，我们试探讨甯氏家族统治钦州时期的经济文化情况。

## 1. 文化

甯氏家族的文化水准在岭南各少数民族酋帅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他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当时钦州尚未设有学校，甯氏族人都继承家学，一代传一代从未间断。《甯道务墓志铭》说甯氏族入“生子髻髻之岁，克承诗礼之风。满门修学之英，名擅簪纓之望”，即是说明这一情况。由于其注重对青少年一代教育，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甯贇墓志铭》评价甯贇的文化程度时说：“公自惠好自研，齐叔乡之德，箴诫和诱，同孟明之温；于藻进贤，常吟雅颂。”甯贇曾随其兄甯长真出征林邑，任水军先锋，指挥作战，机动灵活；编师檄队，颇有谋略。甯长真与甯贇同辈人，为兄长。乃弟如此，乃兄自然也有一定的汉文化素养，否则其在生之时，何以能率部南征北战？甯道务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墓志中说他“幼而颖悟，长而风清。涉猎乎六艺之场，牢笼乎百氏之苑。海内之学，尽在公门”。甯道务曾任官至爱州牧、郁林牧、授朝议郎新州刺史（广东新兴）等职。这类管职不是世袭荫封，而是凭自己的才干获得的。甯道务未涉军门，无尺寸之功，获得这样的职务，当是由于其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平。甯氏家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要算甯原悌。甯原悌是甯纯的重孙。他自小好学，精通诗书，并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甯原悌去长安举试，中进士科第九名。当时参加第试考生共一千余人，甯原悌来自僻壤蛮荒，跻身于前十名，亦非易事，所以于当时便轰动了朝野。甯原悌中进士后，武则天委他为秘书省校书郎，以后任谏议大夫，唐玄宗时又委他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可见甯原悌是盛唐时国内有数的文人之一。由于原甯悌修国史是敢于直书“皇帝讳隐事”，结果“忤旨去官”死后归葬钦州大墓山。甯原悌对甯氏族人的影响较大，直至宋代。其后人仍代有文人学士辈出。宋绍兴年间，甯原悌后人甯宗乔，天性笃淳，学问渊博，颇受当时人的敬重，绍兴十八年甯宗乔举进士第。其弟甯

宗谔，在绍兴二十四年也考取了进士。宋人周去非评价甯氏家族说：“诸甯今为大姓，每科举曾有荐名者。”<sup>[12]</sup>周去非是宋代文人，在桂林任通判期间应钦州学官的邀请曾到钦州讲学，并实地考察了钦州地区的文化，民俗情况<sup>[13]</sup>，他对甯氏家族作出这样的评语是很难得的。综以观之甯氏家族的文化水准非但在本地区影响大，就是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

## 2. 陶瓷制造业

1977年和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分别在钦州久隆发掘了7座甯氏族人在隋唐时期的墓葬。这7座墓葬中共出土了130余件随葬品，其中青瓷器53件，陶器41件。<sup>[13]</sup>这些出土的陶瓷器是本地烧造还是外来的？

迄今，钦州地区尚未发现有隋唐时期的陶瓷窑址遗存。不过，如凭此而断定钦州地区在隋唐时期没有自己的陶瓷制造业，那将是错误的结论。我们认为，隋唐时期钦州地区确实拥有自己的陶瓷制造业。其一，钦州久隆甯氏家族M6墓出土了一件青瓷提梁壶。这件提梁壶，圆腹，平底，半环形提梁；提梁一侧肩上作直口短流，流内作算；通体施青黄釉，胎质灰白坚硬。壶通高21.4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12.5厘米。这件提梁壶造型特殊，颇具地方色彩。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这样型式的壶，壶当为钦州本地区陶瓷工匠设计烧造。其二，甯道务墓中出土的墓志陶碑，据《钦县县志》载：“民二十八年十一月，日寇犯钦仓促不及移藏，捣碎六分之五，现存尾一角，纵横仅一尺，有全碑六分之一。”这样大的陶碑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无疑这块陶碑也是钦州地区的陶瓷工匠所烧造。其三，甯氏族入墓中的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盛行四横系罐、青瓷碗、青瓷杯等器物。器体矮圆，施釉肥厚，釉青中泛黄，胎体有化装土保护，以上特点都带有南朝作风。隋唐时期岭内汉族陶瓷工匠烧造的陶瓷器，在造型上都趋向于瘦长，特别是罐、壶等器物肩上的横系大都变成直竖式或者横竖式，目的是四系与瘦长的器身相应对称，更显得亭亭玉立。为何甯氏家族隋唐墓中出土的器物都未具备这些时代风格呢？唯一的解释是：隋唐时期，岭北地区先进的陶瓷工匠们为适应社会需要，创造出新的器型（即隋唐瘦长型），而广西钦州地区因交通不便，信息梗塞，对岭北新式的型器还未能接受，依然烧造旧式的陶瓷器型（即南朝的

矮胖型)。是此，甯氏家族墓葬内出土的器物当是钦州本地所烧造。

出土器物，青瓷器中有碟、碗、杯、钵、瓶、罐、唾壶、提梁壶等，陶器中有罐、四系罐、钵、釜、带盖小孟等。这些说明，当时钦州烧制的器物主要是生活实用器，不像北方中原地区隋唐墓中常见的兵马俑、仪仗俑、镇墓兽以及其他专为墓葬上眼烧造的冥器。除烧造日常生活实用器外，钦州地区还大量烧造房屋建筑用陶。据考古调查发现，钦州县（今钦州市）久隆隋唐钦江故城遗址，灵山县旧州隋唐南宾县县治遗址，浦北县泉水公社石桶大队坡子坪村的越州古城址，都发现了隋唐时期的筒瓦、板瓦、莲花纹瓦当、兽面纹城砖等建筑用陶。在器物制作工艺方面，工匠们已掌握了用化装土保护胎体法（日本人称化装土，我国称护胎釉，目下学术界倾向于用化装土名称）。由于钦州一地瓷土不纯，多含有其他杂质，制胎时，胎表比较粗糙，如果这时直接施上釉，必须浪费很多釉药，也达不到匀称平滑的效果，工匠于是将比较纯净的瓷土研成粉末，用水调成浆状，然后在制好的器物坯体上涂抹，直至坯体表面呈平滑匀称，然后再施上釉药，其效果就比不上化装土的器物好。在器物装饰手法方面，造作者已娴熟地掌握了印花法。钦州久隆M1中出土了8件青瓷碗，这种碗的里心饰有蔷薇花等印纹。印纹图案系由多次加印组合而成，故有饰纹重叠现象。这种印花法操作过程大致是这样：先将蘑菇形的印模制好，晾干，然后在印模上雕刻蔷薇花图案，再入窑加温，使其坚硬。凡初做好的碗坯，未待干燥，即可用印模按印下去，图案就这样显现出来。

总观钦州地区在隋唐时烧造的陶瓷器，造型合理，施釉匀称，火候也掌握得好，说明这里的陶瓷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 3. 造船业

《隋书》卷五十六载：“时有甯猛力者……在陈日已据有南海。”这里所说的南海，实指北部湾海域。临水使舟，地理环境为甯氏家族发展造船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钦州沿海的越民除制造采珠捕鱼等生产用船外，更主要的是为甯氏家族的水军制造了大量的军舰。隋大业元年，甯赞率本部水军随刘方渡海攻打林邑；又隋末，甯长真率本部越兵攻打丘和于交趾。两次战争都需要船舰把兵员运

送过海。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船舰，欲把数千兵员以及军需运到大海彼岸那是不可能的。令人深思的是，隋大业元年攻打林邑国，刘方身为主帅，为何派甯长真等人从陆路进军，而自率水军从海上进军呢？这说明甯氏家族的水军所乘的船舰在海中比较安全，否则身为主帅且是不习水战的北方籍刘方，决不会轻易冒险乘船出海的。甯贇是水军先锋，他乘的船画有五只鷁鸟，是为楼船。这种楼船上能载人和马匹，船在海中航行，像是赤色雀鸟掠波而进。据《甯贇墓志铭》说：在新庸江一战中，甯贇只有二十艘船，而林邑船舰上千。实际上甯越兵不止二十艘船。因为这二十艘船都是画有五鷁的楼船，是有身份的贵族才能乘坐。《方言》：“鷁，鸟名。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淮南子·本经》：“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据此推论，画有鷁鸟的二十艘船当是甯越水军的指挥船。其他将士乘的船当然要更多一些，否则怎能“偏师檄队”，击溃林邑国上千的水军部队呢？钦州一地所造的船到底有多大？有人站在钦州海岸描述这里的船只时说：“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枪（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圈豕酿酒其中。”<sup>[15]</sup> 据此或可知甯氏越兵船舰之一斑。

制造这样大的船只，必须要有好的木料。钦州海山出产一种奇特的木材，叫乌婪木，山树长五丈多，纹理缜密，用来做大船上的舵“极天下之妙也”。大凡在海上航船，舵上至关重要，几十人的生命系于一舵。别地产的木材用来做舵，长不过三丈，若遇大风恶浪，往往折断。而用钦州海山产的乌婪木做舵，“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sup>[15]</sup> 由于钦州与岭北距地遥远，且交通不便，造船所需用的铁钉、桐油之类物品非常缺少，当地的造船工匠们却能找出其他天然草木作代用品。造船时，船匠们将制好的船板钻孔，然后从山中找来藤蔓系束其间，这样板与板的隙缝很大，造好的船还能下水。他们又找来海中生长的一种名叫茜草的水草，晒干后，塞进隙缝中。晒干的茜草，遇海水后，迅速涨开，船就不漏水了。正是这些能工巧匠们的智慧，使甯氏家族的水军获得了良好的船只装备。但反过来说，也正是甯氏家族注重发展水军，钦州地区的造船业才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 4. 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的一件历史文物。目前我国各地文博单位收藏的铜鼓已有一千三百六十余件，其中广西占五百余件。据研究认为：广西钦州地区灵山县出土的铜鼓具有地方特点。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倾向于将灵山出土的铜鼓作为南朝至唐开元年间的标准器，定名为灵山型。灵山型铜鼓的特点为：鼓面边沿伸于颈外较少，没有垂檐。胸腰际附带状形扁耳。纹饰非常精美。鼓面环行六只三足蛙，有的为六只累蹲三足蛙，有的为三只累蹲蛙，三只单蛙相间。鼓面三弦分晕，但是也有不少二弦晕，晕距很密。鼓面鼓身各有三道较宽的主晕：是为骑兽纹、鸟纹、鸟形纹、螳螂形纹等。主晕外又有四出钱纹、虫纹、席纹、四瓣花纹，边沿饰以蝉纹。到目前为止，灵山式铜鼓已有 72 件散藏在全国各地。据 1980 年调查统计：北京 5 具，上海 4 具，江苏 2 具，湖北 1 具，湖南 3 具，广东 15 具，广西 41 具，四川 1 具。这些数据指的是收藏于国家文物单位的数据，实际上在钦州、灵山、合浦等县群众手中仍藏有不少灵山型铜鼓。笔者曾于 1982 年在灵山县作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又在群众手中征集到六面灵山型铜鼓，据说尚有四面已出土的铜鼓被群众秘藏家中，尚未上交国家文物部门。

关于铜鼓的制造和使用问题，史学家都认为是俚僚人民所造。《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sup>[16]</sup>南朝至隋唐时期，钦州一地是俚僚人民聚居地。史书多称甯氏家族为俚僚酋帅。灵山型铜鼓出土地点均在俚僚人民居住地域内，鼓当是该地区俚僚所造。然而非常巧合的是，灵山型铜鼓最早制造年代是南朝，其消亡时间是在唐朝年间<sup>[17]</sup>，正好与甯氏家族在钦州一地的兴衰史相互一致。

灵山型铜鼓为什么伴着甯氏家族的兴衰呢？我们认为，这与甯氏家族入乡随俗、崇尚当地俚僚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铜鼓在俚僚人民中间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sup>[18]</sup>。甯氏家族世为俚僚酋首，其兴盛时期的甯猛力、甯长真曾率领数千俚僚部兵南征北战，

如果不“鸣此鼓以集众”，必然违反俚僚人民的意志，“到者如云”是不可能的。铜鼓既是甯氏家族统治俚僚人民的权威之物，那么甯氏家族提倡铸造铜鼓就是意料中的事了。这就是灵山型铜鼓兴于南朝，盛于隋至唐初的缘故。

至于说灵山型铜鼓随着甯氏家族的衰落而衰落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广州都督周仁轨率二万人来钦州把甯氏家族剿灭殆尽，唐皇朝强化了对钦州的统治地位，再不允许甯氏家族拥有自己的武装部兵，甯氏族人流散于民间，失去了世袭钦州豪酋的地位。这样原来作为酋帅权威地位象征的铜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逐渐走向衰落。

### 5. 煮盐与采珠业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零四在评论合浦地势时说：“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之藩篱，控蛮獠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文中的“珠官”“盐池”，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合浦一地的经济命脉。广西内地没有盐井，食盐全靠海盐。“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sup>[19]</sup>据统计，广西一地每年需用食盐量：“静江（桂林）岁额八千、融（融安融水）二千七百箩、宜（宜山）四千三百九、邕（南宁）七千五百、宾（宾阳）二千五百、柳（柳州）三千五百有奇、象（象州）三千、横（横县）二千七百、贵（贵县）三千一百有奇、郁林（玉林市）三千、昭（昭平县）三千九百、贺（贺县）五千、梧州二千、藤（藤县）二千五百、浔（桂平）三千、容（容县）三千，凡八千二百箩。”<sup>[19]</sup>八千二百箩的食盐全部由合浦沿海盐场供应。合浦煮海为盐，历史悠久。据《南齐书·州郡志》载，南朝齐时，越州设有盐田郡，可见当时在这里从事煮海为盐的盐民必定很多，因而特设盐田一郡来加强管理，征收税赋。盐田郡在合浦的什么地方呢？《清一统志》载：“石康废县：常乐州元（原）领石康、博电、零绿、盐场四县四县，开宝五年废州，并博电、零绿、盐场三县为一县。”南齐时的盐田郡当是南汉时的常乐州盐场县，宋时的石康仓所在地。隋唐时甯宣合浦太守，这里的盐田生产都归甯氏家族管理，盐田赋税一任他们征收。

合浦的采珠业，历史也很悠久，其上限可追溯至汉以前。《清一统志》载：“孟

尝，会稽上虞人，（东汉）顺帝时，历官合浦太守。郡少产谷，民以采珠为活。先是采珠贪秽，珠逐渐徙于交趾郡界，民无所资。尝至，求民利病，痛革前敝，未逾岁而珠复还。百姓复业，商贾流通，称为神明。”三国时合浦设有珠池郡，唐时设有珠池县。这些郡县的设立都足以证明合浦一地，历代的采珠业相当繁荣。

《新唐书》：“武德六年，（甯）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甯长真把大珠作为地方特产朝贡唐朝廷，他们平时必然驱赶珠民入海采珠，积累财富，献宝邀宠。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刺激了钦州地区采珠业的发展。

## 6. 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情况，标志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贸易的水准。甯氏家族在钦州统治的鼎盛时期，由于人力、财力相对充足，促使他们建造了许多城镇。这些城镇的建造，对于甯氏家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隋唐时期广西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贸易相当繁荣。现将历年在钦州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隋唐城址情况逐一介绍如下：

### 隋唐钦江故城

城在钦州县城东北五十里的久隆公社大队上东坝生产队东北。1963年和1976年，广西文物队和广东省考古队曾两度考察该遗城城址。城址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80米。开有东、透、南、北四城门。南门最宽，是为正门。由是观之，城是坐北朝南。城墙用红色土夯筑而成，极坚实。现在所看到的残存城墙，高出地面5~10米，墙底部厚8米，墙顶厚3~4米。城址四周护城池尚依稀能辨认出来。该城址现已全部辟为水田。城址四野平坦，土质松软肥沃，水源比较丰富。城址内出土遗物：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绳纹红砖、菱纹红砖、青瓷碗片、玉璧形碗足、青瓷罐等。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载：“钦江废县，州东北百三十里（实际上只有五十里），刘宋时宋寿郡治也。齐梁因之，隋废郡为宋寿县。开皇十八年改曰钦江县，为钦州治。唐因之，宋开宝元年五年省入灵山县。”久隆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载大致相符，仅在里程上略有出，这恐怕是顾祖禹没有到实地调查，转



抄前人之文而误。据此，刘宋时这里就是宋寿郡郡治，但从考古发现的器物来看，其年代多系隋唐时器物。估计该城在刘宋时规模较小，隋时将城扩建，而将刘宋时的城址埋在地下，因此我们在地表很难捡到南朝刘宋时期的遗物。甯猛力曾任宋寿县开国侯，此城当系甯猛力在世时扩建。关于钦江故城的位置问题，《明一统志》却另有看法：“钦江故城，隋置，在州东三十里，隋唐时州于此。”《明一统志》所言的钦江故城所在位置，前人已提出怀疑。《读史方輿纪要》说：“（明）一统志，今州东三十里有钦州故城即隋唐时州治，恐误。”据考古调查，在钦州东北三十里地没有发现古城址。唯在钦州东北五十里处有久隆古城址。久隆城址位于钦江江滨，其周围又都是甯氏族入墓，这里是隋唐时钦江帮城无疑。《明一统志》之说，估计是修志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错误。

#### 灵山县旧州古城址

城址位于灵山县旧州公社驻地西南部约 300 米，北靠山冈，东南临旧州河。城址南北长约 300 米，东西宽约 150 米，四周土墙均有残留。城墙残高 2~3 米，厚约 2 米，系用黄色泥土夯筑。北门尚残存，其余城门已全部毁坏。1962 年广东省考古队在旧州城址考察时，在城址内捡到的遗物有筒瓦、板瓦、陶罐口沿残件。依据这些遗物，广东省考古队将旧州城定为隋唐钦江故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旧州城址曾作过钦州州治。《灵山县志》载：“钦州旧址在县西八十里下东乡，今立市名旧州圩，唐自钦江徙州治于此，至宋又自此徙州治于安远。”<sup>[20]</sup>《钦县县志》：“钦州故城，在城东北五十里，地名高沙，土城。隋开皇时，迁于旧州，宋天圣间迁于近海白沙之东即今治。旧州故址尚存。按旧州现为灵山属。”<sup>[21]</sup>以上两志所言各异。到底谁说为对呢？我们认为两说皆误。

《宋史·地理志》：“钦州，甯越郡军事，开宝五年（公元 972 年）废遵化、钦江、内亭三县。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徙州治南宾砦。”《读史方輿纪要》：“南宾废县：县西八十里，隋置南宾县治此，唐改为灵山县。宋志：钦州，天州天圣元年徙治南宾砦。盖尚取故县为名也。治平三年（公元 1066 年）又徙今治。”《钦县县志》：“按南宾砦即灵山旧州圩。徐的因地卑气郁，迁来未久，即有再迁安远之议。”由此可知，宋天圣元年钦州州治从钦江县（即久隆钦江故城）迁到

灵山县的旧州圩。地方换了但县名没有换，仍然叫钦江县。后来作志者不慎审，皆误旧州即隋唐时钦州州治所在。据此可以推测，现在的旧州土城城址当是隋唐时甯越郡南宾县县治。广东省考古队认为土城之外尚有外城，很可能是宋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徙钦州州治于此时所建。

### 越州古城

城在浦北县泉水公社坡子坪大队部前，北距县城约 65 公里，西距公社约 12 公里。古城南濒南流江，依山势构成，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地势极为险要，可扼今浦北、合浦、博白三县交界一带。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墙长 360 米，西墙长 280 米。北墙、东墙依山势构筑，不平直。整个外城面积约为 250 亩，包括四座小山包在内。在城内的东北面有三座山包，呈“品”字形。内城构筑在西部的一个山包上。内城呈长方形：南北宽约为 130 米，东西长约为 160 米。在外城四周均有护城池，现已辟为水田。1962 年，广东省考古队曾试掘过此城，依据出土遗物为据，将此城定为隋城。《清一统志》云“越州故城在合浦县东北”；《广东通志》云“越州故城在县东北八十里”。坡子坪古城址所处的位置与史书所载大致相符。《南齐书·州郡志》载：“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地也。……宋泰始中，两江都护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地当有奇样，启立为越州……元徽二年（公元 474 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坡子坪古城东门为穿山而成，与文载吻合；另外当地群众都称坡子坪古城址为青牛城，与文载“见二青牛惊入草”之说天然偶合，足证坡子坪是为越州古城无疑。越州古城始建于南朝刘齐元徽二年（公元 474 年），但一直沿用至唐代。1978 年，广西文物队曾深入勘察，在城址内发现了残铁刀、方格纹印纹陶等隋唐以前的遗物，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隋唐时期的陶瓷器以及瓦当、城砖。另外，在城内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唐朝乾元年间的铜钟。这说明越州古城在隋唐时期曾经过多次修建。浦北一地在隋唐时是甯氏家族辖地，甯道明据南越州反即是此地。城址的修造与他们有很大关系。

### 浦北县旧州古城

旧州古城南依南流江，位于浦北县泉水公社旧州大队，北距公社约为 1 公里。

因破坏比较严重，无法从地表丈量城址的尺寸，但从整个地势观察，该城址当分成内城和外城。《读史方輿纪要》：“廉州故城：在府东北七十五里蓬莱乡。唐时州治此。”《广东通志》云：“今名旧州村。”1978年广西文物队曾勘察此城址，在城址内发现遗物有：筒瓦、布纹板瓦、莲花纹瓦当、玉璧形碗足、青黄釉陶片等。其年代属唐。考古调查资料与志书记载相符。旧州当是唐时廉州州治所在。《新唐书》卷二百二：“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甯暄亦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考古调查资料中未发现唐以前的遗物，此城的建造当始于甯氏族入甯纯。

## 五、甯氏家族的历史作用

甯氏家族统治广西钦州地区，始于南朝，盛于隋朝，衰灭于唐朝。其历史作用可从两方面考察。第一，维护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稳定祖国南部边疆局势的作用。第二，开发边疆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化。

甯氏家族在广西钦州统治时期，经过两次封建王朝的动乱变更，即陈灭隋兴，隋灭唐兴。每次新皇朝的建立，甯氏家族都帮助新皇朝做了不少的统一工作。

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岭南一地。自晋至隋，中间历三百余年的社会动乱，岭南都保持独立的割据状态，与中原王朝无直接的来往。隋王朝建国后，如何统治岭南各大小独立王国，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凡隋朝廷派遣到广西一地大小独立王国任职的官吏，委任状下了，而官员无法上赴任履职，造成了“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隋文帝曾一度派兵镇压，但是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一旦大兵撤走，这些大小独立王国的酋帅们又我行我素，拒不朝贡，不接受隋王朝的诏令。再次用兵征伐，千里征途，消耗人力财力无数，对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撒手不管，任这些王国闹独立，又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事实长期以来作为心病压在隋文帝心头，于是迫使他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然而，隋初广西各路酋帅，自霸一方，或保境自守，或公开抗拒中央王朝的统治，此时如无一权威人物是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甯猛力正是隋文帝相中了的权威人物。他识大体、顾大局，且拥有雄厚的财力、人力，又是祖辈居住在广西的世袭酋帅，在广西各

族人民中威信很高，只要甯猛力表示臣服隋王朝，就可以带动其他大小酋帅一同归顺隋王朝的领导，隋王朝就可以不费一刀一兵而使广西政局稳定下来。开皇末年，何稠带兵平息了桂州俚帅李光佛的叛乱，班师回朝后，何稠对隋文帝汇报说，甯猛力欲随同进京诣见，但没有带他同行回京师，隋文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又听说甯猛力死了，隋文帝非常抱怨何稠：“你为什么不带他来？现在他竟死了！”话中大有失之交臂、无限懊恼之情。结果甯长真受甯猛力嘱托进京诣见了隋文帝，隋文帝很高兴，赞扬何稠“著信蛮夷”。可见隋文帝时时刻刻在惦记着甯猛力。为什么隋文帝这样器重甯猛力呢？主要是希望甯猛力能起到安定广西局势的带头作用。遗憾的是，甯猛力没有来得及见到隋文帝而身先死去。但是他临终前嘱咐儿子甯长真说：“我与大使为约，不可换信于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这些肺腑之言，足见甯猛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大业，颇具诚心。后来甯长真如言进京，一脉承甯猛力的意志。我们从史籍记载中发现，自开皇末年，甯长真带头臣服隋王朝后，就再也没有发现隋王朝对广西用兵的记载。恰恰相反的是，甯长真率本部精兵协助隋王朝南征南邑，北伐高丽，为隋王朝立下了功勋。

隋灭唐兴，在唐王朝统一广西的战争中，甯长真起的作用也很大。李靖率领唐兵从北而南攻打肖铣，甯长真却在南部起兵攻打肖铣的州县，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甯长真是否与李靖有过联系，但甯长真的行动实际上产生了与唐兵遥相呼应的效果。《新唐书》：“武德初（甯长真）以甯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这一段文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唐初甯长真已拥有甯越、郁林郡等地，这些地区都是通往交、爱数州必经之地。如果甯长真据地顽抗，那么唐王朝欲纳交、爱数州入版图内就很困难。但是甯长真没有与唐兵对抗，而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在甯长真的支持下，以上州郡很快就平定下来，使唐王朝省去许多兵力、财力。无人、财耗而能维护唐朝在岭南的大统一局面，甯氏岂无其力？

南朝至隋唐时期，甯氏家族辖地内部都是俚僚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特别是西原地区和合浦大廉洞一带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人还过着比较原始的氏族生活。国子祭酒韩愈在谈到西原地区人民的社会情况时说：“臣

去年贬岭外，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合浦大廉洞一带的少数民族社会情况也和西原地区差不多。据《南齐书·州郡志》说：“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地。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由于以上地区，地处边远，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很难直接影响到其中腹部，长期以来其内部社会发展很缓慢。陈末隋初甯猛力亲自去西原地区作说服开拓工作，又派他的弟弟甯暄到合浦大廉洞一带地区工作。<sup>[22]</sup>结果合浦大廉洞一带的俚僚人民纷纷从深山里出来，报籍编户，于是这里增设了大廉、蔡龙两个新县。钦州以西的西原地区，尽管经过甯猛力的努力，许多俚僚人民仍然未愿意编籍入户，因此还不能增置新县。直至贞观十二年“清平

公李弦节，遣钦州首领甯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襄州”。

<sup>[23]</sup>襄州在今上思县境，唐贞观时“领县四：临江、鹄山、宏波零远，与州同置”。

<sup>[24]</sup>甯氏族人为祖国新开拓了许多州县，向这些地区的人民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缩短了与汉族的距离，无疑是甯氏家族的一大功绩。

另外，甯长真在世时，参加了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南征林邑，一次是北打高丽。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甯长真参加的这些战争，其动机是抱着忠君的思想，有其积极意义的因素包含其间。每次战争，甯长真都是率本部俚僚兵去。这数千部兵，来自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弟。他们走出去以后，与广大的汉人民、汉族将士接触，所见所闻，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劳动生产，在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中，作用之大，可想而知。就这点而言，甯长真要比那些闭境锁国，拒先进的汉文化于门外，死抱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不放的酋帅的作用要大得多。

（原载《广西民族参考资料》1986年第六辑）

---

[1]《隋书·何稠传》：“猛力（甯逵子）与臣为约，假令身先死，当遣子入传。越人性直，其子必来。”

[2]《资治通鉴》卷178：“俚帅甯猛力，在陈时已据有南海。”

[3]粟冠昌《广西土官成分再探》，《学术论坛》1981年2期。

[4]《粤述》载：“桂林等府具有盘主庙，瑶童祀为始祖。其土官多姓韦，乃韩信子孙也。云：方吕后擒信

时，舍人负其幼子救于肖何，何乃书囑粤尉佗，抚之子孙。因以韦姓。”引《小方壶斋丛钞》七佚。

[5]《资治通鉴》卷163。

[6]《资治通鉴》卷178。

[7]民国《钦县县志·人物志》卷4。

[8]（清）汪森《粤西丛载》卷27。

[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

[10]《新唐书》卷222。

[11]（清）汪森：《粤西丛载》卷27。

[1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

[13]（宋）张栻：《钦州学记》，转引自《钦县县志，艺文志》。

[1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考古》1984年3期。

[1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16]《隋书·地理志》。

[17]张世铨《论古代铜鼓的分式》，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18]《太平御览》卷785引晋斐渊《广州记》。

[1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

[20]民国《灵山县志·輿地志》。

[21]民国《钦县县志·名胜志》。

[22]《资治通鉴》卷241。

[23]《旧唐书》卷41。

[24]《太平寰宇记》卷167。

## 八、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甯氏与甯城 ——隋唐岭南甯氏家族祖根探论

张新斌

清道光年间及嗣后在广西钦州境内发现的隋代甯贇、唐代甯道务墓中分别出土了《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以下简称《甯碑》）和《刺史甯道务墓志铭》（以下简称《甯志》），是研究岭南甯氏族源的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杨豪先生对上述碑志进行了考证研究，推翻了甯氏家族族属的百越和越族说，得出了岭南甯氏家族早期远祖“居今河南、山东境”的新结论，为岭南甯氏家族寻根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有关早期甯氏的资料散见于诸多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系统整理

这些资料后，我们基本勾勒了早期甯氏的历史并对岭南甯氏的祖根的探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不妥之处，请学界同仁指正。

## 一、东周时期卫国的甯氏公族及谱系

《甯碑》在追述甯氏祖根时，有“故甯相、甯渝传昆玉之名，甯喜、甯戚纾遗芳之哲”的记载，以上诸甯氏皆春秋时期卫国的世卿，“卫武公子和季食采邑于甯因以为氏。”文献所见卫国诸甯主要有：

1. 甯跪：《左传·庄公六年》云：“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甯跪为见于《左传》记载的第一个甯氏族人。《世族谱》云，甯跪为甯速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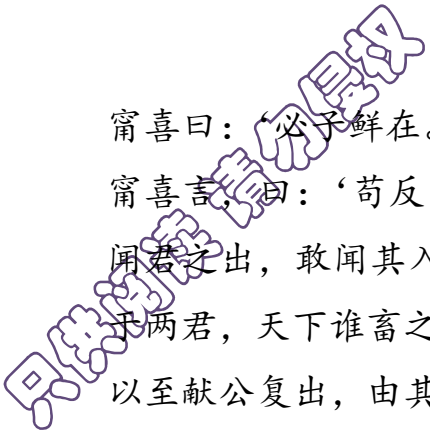
2. 甯庄子：《左传·闵公二年》云：“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杜预《世族谱》云，甯庄子为甯跪之孙，甯穆仲静之子，名速。但甯穆仲静未见于《左传》记载。

3. 甯俞：俞又作渝、愈，又别甯武子。《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卫出公自城使以弓问子赣，且曰：‘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对曰：‘君不谿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孙于陈，甯武子、孙庄子为苑濮之盟而君入。’”甯俞为卫国甯氏代表人物，因而在《甯碑》中专门记述。

4. 甯相：《左传·成公二年》云：“卫侯使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甯相为甯俞子。

5. 甯殖：又称甯惠子。《左传·成公十四年》云：“卫侯饒若成叔，甯惠子相，若成叔傲。”《吕氏春秋·慎小》言：“卫献公戒孙林父、甯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曰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说，逐献公。立公子黑甘。”甯惠子历卫定公、卫献公和卫殇公三政，其受托顾命、盟誓诸侯、怒逐献公，在甯氏辅卫史上占据有突出的地位。

6. 甯喜：又称甯悼子。《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初，献公使与甯喜言，



甯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则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贰。’”甯喜专权于卫，以至献公复出，由其周旋而成，但遭杀身之祸，以至甯氏散居四方，揭开甯氏早期迁移的序幕。

关于卫国甯氏祖根，《姓氏急就篇》《姓氏考略》《世族谱》等均言甯氏出自卫国王室或云武公之后，卫武公姬和（?~公元前758年）在卫国史上在位时间较长，并因辅佐周平王东迁而命为公。据有关姓氏类书卫国甯氏自武公之后至甯喜共历九世，《左传》记载的甯氏事迹自鲁庄公六年（公元前88年）至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有甯跪、甯速、甯俞、甯相、甯殖、甯喜，其承继甯子爵佚的大致谱系为：

(公元前770年左右)	和季 壹	卫武公姬和之子，食采邑于甯
?	甯 速	事迹不祥
	↓	
(公元前688年左右)	甯 跪	辅卫黔公、卫惠公
	↓	
?	甯???	事迹不祥
	↓	
(公元前600~公元前634年左右)	甯庄子	辅卫懿公、卫戴公、卫文公
	↓	
(公元前630~公元前623年左右)	甯 俞	辅卫成公
	↓	
(公元前589年左右)	甯 相	辅卫定公、卫穆公
	↓	
(公元前577~公元前553年左右)	甯 殖	辅卫献公、卫殇公
	↓	
(公元前553~公元前546年左右)	甯 喜	辅卫殇公、卫献公

另外在甯俞与甯相之间有甯羸，《左传·文公五年》载：“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羸从之，及温而还。”其与上述诸甯似无直承关系，但为甯氏族当



无疑问。

## 二、东周时期甯氏族人在卫国的地位及作用

甯氏族人既为卫国王室贵族，因而在卫国的内政、外交及军事诸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一) 军事方面。卫庄子时，狄人伐卫，《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与甯庄子“矢”，甯氏在国难之时，受矢而战。《左传·成公二年》记载，甯相受命与诸大夫伐齐。甯氏虽曾受命御敌卫国，但因国力衰落，因而甯氏在军事方面仍然少有建树。

(二) 外交方面。卫国处于大河北岸的平原之上，无险可拒，东有齐鲁，西有强晋，因此外交工作对卫国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而甯氏正是在外交辅政方面有所建树。

第一，修礼于晋：晋文公主政之前曾亡走列国。《国语·晋语》云：“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甯庄子言于公曰：‘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国无纪不可以终，民无结不可以固，德无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弃之，无乃不可乎、晋公子善人也，而卫亲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图之……君弗早图，卫而在讨，小人是惧，敢不尽心。’公弗听。”甯氏修礼于晋的主张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可惜没有被采纳。

第二，盟誓诸侯：主要代表卫国，参加与鲁国和晋国的盟会。《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甯速盟于向”。又，传云“王会莒兹平公、甯庄子盟于向”。《左传·襄公八年》：“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甯殖、邾大夫会之。”又有温之会，《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诗歌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甯殖、郑公孙蚕、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第三，去鲁聘问：《左传·文公四年》：“卫甯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淇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甯武子在与鲁的交往中不卑不亢、义正辞严，

不仅达到与鲁国再修旧好的目的，也深得鲁国的尊敬。从前述可知，甯氏无论是在盟会、聘问中还是在卫国与晋、鲁的交往中都是积极的实践者。

### (三) 内政方面。

第一，博学多辩。《左传·僖公十九年》：“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舆而雨。”占卜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政事活动，因此卜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甯氏在卫国正是这样重要的角色。另外，《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问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子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郕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闻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在先秦等级森严的礼制社会里，甯氏竟以平等地位与卫侯讨论祀礼，说明甯氏族人具有极高的身份。此外，甯氏族人这种博学多辩的才能，使他们无论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尤其是甯武子，在处事上的巧妙艺术，深得孔子的赏识。《论语·公冶长篇》有“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第二，临危主政：卫成公时期，采取了与楚修好的政策。公元前632年，楚伐宋，晋文公发兵救宋，卫成公不予答应。后城濮大战以楚败而告终，卫成公只好出逃于陈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六月，晋人复卫侯。甯武子与人盟于宛，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反映了在卫成公复位问题上卫国内部存在较大分歧，甯武子参与的宛濮之盟，为消除内部的分歧与误解奠定了基础。卫成公复位后并没有完全遵守事先的承诺，杀害了叔武、颀犬，亲晋的元咺逃亡到晋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侯与元咺讼，甯武子为辅，鍼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谓甯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诸深室，甯子职纳橐饘焉。”这次聚会，众多诸侯参加，晋文公并亲自召请周天子到会，在处理卫侯与元咺的诉讼上，尽管甯武子作为卫侯的诉讼代理人没有胜诉，但为其赢得了信誉。《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使医衍鸩卫

侯，甯俞货医，使薄其鸩，不死。”甯武子在关键时刻，又保护了卫成公的生命，成公复位后，甯氏得以重用，其家族声望日隆自不待言。

### 三、甯氏族人在卫国的鼎盛和败亡

甯氏家族在卫国位高权重，一方面是以其对国君的忠诚而博得了历代卫侯的认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博学多才，且能临危受命，承担起辅君保国的历史重托。

《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卫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以为大子。冬十日卫定公卒。”但在后来却发生了“逐献公”的事件。《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吕氏春秋·慎小》亦载：“卫献公戒孙林父、甯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人侍君，日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说，逐献公，立公子黜，卫庄公立。”《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最详：“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孙文子、甯惠子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卫献公召见大臣欢宴而又受到冷落，亲着猎服而与身着朝服的臣下谈话，在当时是不合乎礼制规范的。孙文子与甯惠子均为卫国望族，在卫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怠慢行为自然引起了孙、甯二子的不满，但在对献公的逐杀中，主要是以孙氏的势力进行的，尤其是孙文子先杀害了献公派来的子姪、子伯、子皮，又杀了献公派来的子行，献公逃往齐国，甯惠子尽管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厮杀，但从内心对献公不满，因而便参与了立殇公的活动。甯氏族人具有较强的忠君意念，逐献公的事件虽已过去多年，矛盾的心理始终折磨着甯惠子。《左传·襄公二十年》载：“卫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悼子甯喜继承了甯氏家族在朝政中的大权，同时也继承了惠子临终前的嘱托及复杂的矛盾心理。

关于卫献公复国一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甯喜言，甯喜许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初，献公使与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妣，以公命与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则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贰。’穀曰：‘我请使焉而观之。’遂见公于夷仪。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无忧色，亦无宽言，犹夫人也。若不己，死，无日矣。’悼子曰：‘子鲜在。’右宰穀曰：‘子鲜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为？’悼子曰：‘虽然，不可以已。’”以上情况说明，甯喜一方面在卫献公的复位问题上举棋不定但却要实现先人的遗愿，另一方面卫献公待人的秉性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甯氏的悲剧结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大叔文子对该事的深刻评价：“乌呼，诗所谓‘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者，甯子可谓不恤其后矣。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公甯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孙氏，不克，伯国伤。甯子出舍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甯子，甯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及太子。”但《史记·卫康叔世家》则称，卫殇公“十二年，甯喜与孙林氏争宠相恶，殇公使甯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与卫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甯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以上所记甯氏与孙氏在殇公时期可能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甯氏迎接献公复位的问题上，甯悼子一方面要实现先人的遗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与孙氏的朝权之争中占据上风，并不惜冒杀君之名的风险。而孙氏带领自己的门人及土地投奔晋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孙林父以戚如晋。”又：“卫人侵戚东鄙，孙氏于晋，晋戍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遂

从卫师，败之。雍鉏获殖綽，复想于晋。”因此卫国甯氏的势力不仅围打孙氏，并侵占孙氏的戚邑，杀死戍守茅氏的三百晋卒，自然引起了晋国的不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还载，“晋人为孙氏故，召诸侯，将以讨卫也。”“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于是卫侯会之，晋人执甯喜，北宫遗。……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卫国的殇公与献公之争、孙氏与甯氏之争，说到底是大国争霸的反映，献公亡而奔齐、孙氏败而投晋，因而《史记》上记载的晋国囚禁的卫侯只能是卫献公。正因为献公与齐国的深厚关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直到冬十月以后，“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卫献公才得以回到卫国主政，甯、孙之争与献公复位才暂告结束。

从史料上观察，一方面，甯氏辅卫史上主要是以其自身的博学多辩，在关键时候独当一面，另一方面甯氏虽然得知晋、齐、楚争霸中原，而卫国应充分利用三者间的矛盾赖以图存，甯氏以其对国君的忠诚并没有附庸于某一大国，但当甯喜之时，因献公被逐而留下难平的君臣之隔，因孙林父被击而明显的开罪于晋国，使甯氏家族陷入了困境。《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卫甯喜专，公患之，公孙免余请杀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事未可知，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夏，免余复攻甯氏，杀甯喜及右宰穀，尸诸朝。”卫献公对甯氏耿耿于怀，因而便借公孙氏的势力消灭甯氏之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卫人讨甯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甯氏族人在卫国的显赫历史宣告结束，甯氏族人的大量外逃便也由此全面开始。

#### 四、东周时期甯氏族人的外迁

甯氏族人的外迁是以卫献公时大量捕杀甯氏族人的大规模趋势的，但甯氏族

人在春秋时期已开始到列国为士，并有所建树。

第一，齐桓公时的甯戚。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早成就霸业的国君，而《国语·齐语》认为，其“唯能用官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

甯戚是甯氏族人无疑，但绝非嫡支，因而便早早到列国谋生。《吕氏春秋·举难》云：“甯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烛火甚盛，从者甚众。甯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甯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常举也，桓公得之矣。”《淮南子·道应训》记载的甯戚饭牛车下的故事与此详细相当，只是将甯戚误写作甯越。齐桓公任人唯贤在当时亦传为佳话。《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所载邹阳在狱中的上书中亦专门引用了“甯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的典故。《吕氏春秋·直谏》云：“齐桓公、管仲、鲍叔、甯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甯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甯戚是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重要谋臣之一，他祖籍于卫，亦是当时公认的。

第二，楚庄王时的甯国。《吕氏春秋·似顺》载：“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甯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楚庄王亦为春秋五霸之一，其有重要谋臣甯国，反映了甯氏族人此时已远足荆蛮，向南方挺进。

第三，晋智伯时的甯跪。《左传·哀公四年》载：“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甯跪救范氏。”此时为公元前491年，为卫出公时期，较之甯喜已相去50余年，梁履绳《补释》引孔广居云：“《说苑·后思篇》有卫文子，与智伯同时，疑即此

甯跪。”从前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立石圃守祀的记载来看，古代君王为表示仁政而命其近族守祀，而甯跪与《左传·庄公六年》的甯跪绝非一人，其有可能为甯氏守祀的甯文子，并在卫、晋一带活动。

第四，周威王时的甯越。《吕氏春秋·博志》载：“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甯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在《风俗通义校释》卷一中，甯越是与苏秦并列的六国谋士之一，《汉书·艺文志》专载有《甯越》书一篇。中牟，《史记》正义：“汤阴县西五十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之侧也。”中牟邑的遗迹在今鹤壁市鹿楼乡故县村附近，曾为卫之西鄙，春秋时为晋地，后为赵国之都，在当时中牟以好读书出人才而著称，甯越便为其中的佼佼者。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甯戚为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时人，约与甯庄子同时；甯国为楚庄王（?~公元前591年）时人，约与甯相同时；甯跪（约生活于公元前491年）、甯越（与公元前426年~公元前402年的周威烈王同时）则在卫国甯氏外逃后，尤其是甯越以中牟为籍，与甯戚“卫人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反映了在战国时期甯氏族人亦散居各地，但无论如何先秦时期甯氏族人以其博学多辩、忠君爱国而著称。

## 五、先秦时期的甯地及甯氏封邑

甯氏为卫国世卿，并以卫国为籍，但其封邑之地甯，却是很早便见于甲骨、金文字记载的。甲骨文常见“甯”字，一期、三期、五期卜辞中“甯”字的写法有所区别，但均与商王的田猎联系在一起。如：“丙戌卜，□贞：翌丁亥我狩守，贞：翌丁亥勿狩甯？”（《合集》11006）又，“乙未卜，贞：在甯田……”（《合集》28196）。“壬寅卜：王其田□甯□，先□无灾？□。王永。”（《合集》28398）西周时期并有金文资料如甯觶、甯尊、甯母鬲、甯簋和甯簋盖。以上各器可定为西周早期器，而羗鼎中有甯叔为西周中阳人。甯簋盖，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其铭文为：“甯肇淇乍乙考□奠□，其用名□百神，用妥多□福，世孙子宝。”该器为大鸟花纹，陈梦家先生将其定为西周康王器。东周时期有甯钮，其铭文为“廿

七年甯为钮。”甯戈，其铭文为“王年龚立命（令）甯，左库其币长兑□，冶数□。”甯剑，其铭文为“十二年甯右库，州五。”甯鼎，其铭文为“二年甯□子□，冶播为财，四分□。”金文所见各器，反映了除文献上所见甯氏外，还有其他的甯氏族人，尤其是战国时有的并为魏国共县令。另外甲骨文中的甯作为田猎区的地名，与甯剑上甯右库，方足布上的“甯”字币，均说明甯作为地名的历史悠久，陈梦家先生将其考定为商王沁阳田猎区内，今获嘉修武境。但郑杰禅先生将甯具指为今获嘉县城，仍有研究之处。

文献上有关甯地的记载较常见，如《左传·文公五年》：“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嬴从之，及温而还。”《国语·晋语》：“阳处父如卫，反，过甯，舍于逆旅甯嬴氏。”以上自卫至温，甯为必经之地。《左传·定公元年》云：“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梵焉，还，卒于甯。”《史记·魏世家》云：“通韩上党于共，甯，便道安城，出入赋之。”从以上的甯与大陆泽、共城、温城来看，甯城在今获嘉修武一带当是不错的。《水经注·清水》云：“修武，故甯也，亦曰南阳。”实际上在研究商周畿域史时，对于南阳、修武、甯认识不清，并将三者混为一谈。从史料观察，至少在战国时三者是并存的，如《战国策·赵策》云：“秦攻魏，取甯邑，诸侯皆贺。”《战国策·魏策》云：“秦拔甯邑，魏王令之谓秦王曰：‘王归甯邑，吾请先天下。’又：‘秦罢邯鄲，攻魏，取甯邑。’”以上所记“甯”。《韩非子·初见秦》载：“拔邯鄲，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以上记“修武”。《吕氏春秋·去私》云：“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以上专记与晋相关的“南阳”。而《括地志》卷二载：“怀州修武县，本殷之甯邑。”《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载：“修武县，本殷之甯邑。”修武境内有大量的商代遗存，我们认为商代以来的甯邑应为今修武县城所在。另外，文献上有“二甯”的记载，《战国策·魏策》云：“魏王曰：‘王无听，魏王见天下不足恃也，故欲先构。失亡甯者，宜构二甯以求构；夫得甯者，安能归甯乎？’”彭邦炯先生在研究武王伐纣的路线时，注意到了“二甯”，但他在引用《战国策·魏策》时的“通韩上党于共甯”，将共与甯释定为一地，并以为共甯应为清人吴作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的“上甯”之地。但所谓韩



国上党郡与其都城相连的孔道之一，共、甯二城为必经之地，共为共工氏的早期集居地，西周时为共伯和之国邑，历史相当悠久，而绝非有所谓“共甯”之邑。关于二甯，《括地志》卷二载：“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甲骨文中便有“大甯”（《甲》2476）的记载，结合《史记·秦本纪》“更名甯新中曰安阳”，《修武县志》云：“春秋南阳城在县北三十里，又名安阳城。”此安阳城很有可能为小甯城，位于大甯城（今修武县城）的西北。今焦作市北郊的安阳城村，当地仍有残垣，长百余米，高出地面1~2米，其附近有大陆村并有密集的遗址分布，古代的大陆泽当离此不远（关于南阳、修武、甯三城的历史，我们的结论为：南阳，秦时改设修武县，唐以后为今获嘉县城；修武，秦汉时为区别于修武县城而改称小修武，因韩信屯兵又称“齐王城”，讹传为齐州城即今获嘉县的齐州故城；甯即唐代至今的修武县城）。

从以上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卫国世卿甯氏的封邑甯，早在商代时便已出现，并有大、小两个甯城，地在今修武县城及其附近，春秋时甯氏均应以此为籍，但由于甯氏在卫国为卿，卫与齐国相去不远，甯氏赴齐者尤以甯戚为代表，这便形成了《甯碑》所记的早期甯氏的山东籍，但甯氏的祖根应为中原地区的甯城，即今修武县城及附近。

## 六、隋唐岭南甯氏家族祖根探论

广西钦州久隆甯氏家族墓地的发现是广西隋唐考古的重要收获。甯氏家族墓葬主要分布在久隆乡的新圩、青草、新明、高营以及本吉乡的古龙等地。在大务岭（大墓岭）东麓、东起久隆平心，南到新明石狗坪（称七星坪）绵延10公里，形成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地。关于岭南钦州甯氏家族的族属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清代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明石狗坪发现的隋大业五年（公元207年）甯贇墓和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平心圩山麓发现的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甯道务墓，分别出土了《甯越郡钦江县正义大夫之碑》、《刺史甯道务墓志铭》。其中《甯碑》中谈及甯氏祖根时有“窃以太□之末，分□史之邦；唐叔之余，为管、鲁之国。……宗子维城，各理封疆之邑，故甯相、甯渝传昆玉之

名，甯喜、甯戚舒遗芳之哲。”《甯志》中有“列封于甯城”“列国于齐，锡封于甯”的记载，这说明岭南甯氏以先秦甯氏为祖根，而追根寻源，其根在中原的大、小甯城（今修武县城及附近）。甯戚作为甯氏家族中的优秀人物很早便到山东齐国活动，山东并有济水之甯（今济宁），说明山东齐国的甯氏在甯氏家族史上亦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但齐国甯氏的祖根亦在卫国，今豫北修武的宁城。

第二，根据《甯碑》及《甯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南朝至隋唐时期甯氏的大致谱系。南朝时甯逵于梁敬帝时出任定州刺史，总督九州诸军事；陈宣帝时除授安州刺史。其子甯猛力在隋文帝时除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其孙甯长贞（真）先任隋钦州刺史，寻进开府仪同三司，钦江县开国公；又任右光禄大夫、甯越郡太守。次孙甯赞为钦江县正议大夫。而甯长贞之子甯璩、其孙甯道务于唐初分任新州或封州刺史，甯氏家族在南朝隋唐时期世代为官，且主要在岭南一带任职，其姓名分野清晰，与蛮、越、俚、僚、黎等少数民族有名无姓的习俗相差甚远。’但是岭南甯氏在《新唐书》中被称为“僚”或“越人”，在《资治通鉴》里称为“俚”人，似应与甯氏家族在岭南世代为官，由于当地为僚、俚、越人的集居区，甯氏族入又常常以他们的代表而自居，因而忽略了他们“建国兴邦，纯守边疆，威流五岭，勇振三湖”的历史。岭南甯氏长期以来为中央政权镇守边陲，并始终得到中央政权的重用与认可，而这样一支在边疆长期经营的政治势力，在中央政权力量有所削弱、国家动乱之时，往往造成地方割据势力，为了有效控制杂居的少数民族而称姓异族。但由于长期以来汉族及古代社会中的正统观念，在碑志等正式文字中对其族派的认可便成为极为难得的族属甄别的关键性资料。

第三，钦州甯氏墓地的发掘工作有所进展，1977年6月发掘了位于青草附近的6座墓葬，1981年又发掘了石狗坪的1座墓葬。以上墓葬均为中小型的券顶砖室墓，一般由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平面可分为“凸”字形、“中”字形和“干”字形，或为双室并列、同坟异穴的夫妇合葬墓。随葬品以青瓷器和陶器为主，也有铜镜、铜钱及其他金属器。上述墓葬的形制、葬品的配置及器物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朝风格；而壁龛、灯龛和边沟的设置等，又具有隋代和初唐时的特色。其中

5号墓出土的隋五铢和十二生肖纹铜镜,7号墓用的莲花纹砖、叶脉纹砖,随葬的开元通宝钱,与正好处在甯贇、甯道务两墓之间的位置年代相符合,亦应为甯氏家族成员。这批墓葬与同期汉族墓无大的区别,亦无浓厚的地方或族属特色。这些发现进一步从实物上为岭南甯氏家族墓的族别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于岭南甯氏由中原南迁的时间,从大的来讲“大体发生在战国末年迄南朝这段时间,即始自秦汉魏晋时间迁徙”,但从中国历史上大的移民潮分析,甯氏家族在秦汉时期并未在岭南形成望族,而晋代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岭南甯氏家族当在此时由中原迁移到江南,并在岭南发展,南朝隋唐时期而形成独占边疆的政治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广西有南宁、邕宁、宁明、新宁、兴宁等与甯氏相关的地名,这些地名的社会历史含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杨豪. 岭南甯氏家族源流新证[J]. 考古, 1989 (3).
- [2] 彭邦炯. 武王伐纣探路[J]. 中原文物, 1990 (2).
- [3] 张新斌. 河南鹤壁鹿楼古城为赵都中牟说[J]. 文物春秋, 1993 (4).
- [4] 刘体智. 小校经阁金文塌本[M]. 1935.
- [5] 罗振玉. 三代吉金文存[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3.
-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7]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五)[J]. 考古学报, 1956 (3).
- [8] 黄盛璋. 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学报, 1974 (1).
- [9] 于省吾. 商周金文录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 [10]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1] 郑杰祥. 商代地理概论[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 [12] 张新斌. 共城史迹考论(待刊稿).
- [13] 张新斌. 新中城与新乐城(新乡城市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研究)[J]. 平原大学学报: 综合版, 1994 (1).
- [14] 张新斌. “甯新中”地名与地望考辨(兼论隋唐以前新乡、获嘉、修武等城址的变迁及城名的纠葛)[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3 (2).
- [15] 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J]. 考古, 1984 (3).

(本文原载《平顶山师专学报》第16卷2001年第01期)

## 九、岭南甯氏家族源流新证

杨 豪

岭南的广东西部，广西东南部，包括今钦县（即钦州）、合浦、灵山、吴川、北流、玉林等十几个县市境内，居住有一支以甯为姓氏的民族群，此民族群，自隋唐后于祖国南陲已发展成为一支子孙昌盛、居地广阔、于岭南史坛并已有了一数不上声望及影响的望族。

对甯氏家族的源流，《北史·令狐熙传》记南朝陈的“岭南夷数起乱”时，都曾把他们并于“岭南夷”的族群；《隋书·何稠传》载云开皇年所发生的“桂州（今广西贵县境内）俚李光仕聚众为乱”事件时，亦把他们归并在“桂州俚”的族群；《亲唐书》则称甯氏是“南平巨帅（首领）”“西原蛮”的族人；明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名宦》又说甯氏“本乌武獠，世为南平渠帅”；及后并常见称为是地方土司、土官，累累见著于史籍。这样，该甯氏家族的族别，在隋唐以后史籍归类中，便都给归入了古百越族人行列，而且还记作是岭南的一支原居土著族群。这问题已关系到南方民族族群的历史渊源研究，均有重新探究的必要。今广西甯氏族家族聚居的钦州境，出土有两方碑记。其一是清道光年间所出的隋《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另一为继后同在当地出的唐《刺史甯道务墓志铭》。两碑分别出自隋代甯贇与甯道务两人的墓内，均是铭记该两人生前历史的墓志铭。今细读其文，感受到史书称该甯氏是岭南百越族人及原居土著说，均无依据。

### 甯氏家族非岭南原居土著

隋《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以下简称《甯碑》）记载甯贇的籍贯时是：“冀州，临淄人也。”唐《刺史甯道务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记甯道务籍贯时，也称是“临淄人也”。

临淄，是周代齐国国都所在地，汉唐时代仍称临淄，地在今山东淄博境内。

对甯氏族人的远祖，《甯碑》中还撰有：“故甯相、甯渝传昆玉之名，甯喜、甯戚纾遗芳之哲。”其甯相，据《左传》成公二年记：“卫侯……甯相向禽将侵齐”；甯渝，据《春秋·公羊传》文公四年载：“晋侯伐秦。卫侯使甯俞来聘”；甯喜，同上书襄公二十六年载：“晋人执卫甯喜”；二十七年：“卫杀其大夫甯喜”。而甯

戚，原本也是卫国人，其后因去了齐国，这才成了齐国一员大夫，事见《晏子春秋》。

卫国是公元前 11 世纪周公平定纣子武庚反叛后给唐叔分封的一大国，国都设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后迁楚丘（今河南滑县），再后转徙帝丘（今河南濮阳），及后，再迁野王（今河南沁阳）等地。公元前 209 年为秦所灭。齐国是公元前 11 世纪周成王为吕尚分封的一诸侯国，国都设营丘（后称临淄，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也于公元前 221 年为秦所灭。因此，甯氏家族远祖，早期都是居今河南与山东境，其原出籍贯地望月，加上甯贇等人的“临淄”说，明显也该都在今山东迄淮河流域一带。

再以所称甯氏族言，历史上早期居岭南的土著或越称族群，他们皆都习惯只有名而无姓。此种现象，俚称遗裔，今之海南岛黎族群，仍有此俗保留，即他们都只有祖辈排列所取的名，而无姓；即使是有了一些，也都只见外围与汉族接触地区，同时还多见于汉族登记户册一类场合由他人代称而成。于云南，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双版纳考察时，也见于该地汉时称滇越、掸，今为傣族的越族遗民中保留。查阅《周书·异域上》所载獠（即）僚族，也见载：“俗多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暮、阿段，妇女阿夷、阿第之类，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就是于《史记》《汉书》中所载越人：吴阳、吴芮、毕取、居翁、骆力矿与越王摇、无诸、郢及丑等，所称亦同样是名，而非姓。《史记》闽越郡中的“姓骆氏”，《集解》：“徐广曰：骆一作骆”。其具体所示也仍非姓，而是族群称谓——骆。

综上所述，甯氏家族族属的百越志越族说、岭南的土著说，都缺乏事实依据；按上两出土碑文，他们都是秦或汉族人；就其远祖，依《后汉书·东夷传》引《王制》载有“东方曰夷”，早期也都该是东夷称的族人。

### 甯氏家族南徙时间、路线

对于甯氏家族的南徙时间与路线，《甯碑》与《墓志》均缺具体记述，但据两碑均有甯氏家族到岭南定居始自南朝说，即梁时甯贇祖父甯逵的出任定州（今广西玉林一石南）、安州（今钦州境）刺史。而定州，据《隋书·地理志》载，

是始置于梁，安州，依《嘉靖钦州志》载，也始设于齐。那对该甯氏族族群的徙迁岭南，便当大体发生在战国末年迄南朝这段时间，即始自秦汉魏晋时迁徙。

其迁徙路线，依《甯碑》中的：“公匡衡在辅……所以繁衍陵穆，盘根闽越者哉”，与“令美闽越，德隆番邦”；《墓志》的：“干蛊之任，迁移钦江，长为茂族，永保家邦”等语，其“公匡衡在辅”与“所以繁衍陵穆”句，都已言明甯贇及其祖辈抵岭南皆出自担负朝廷委派官职。其“盘根闽越”“令美闽越”中之“闽越”，若连读，它是泛指古代居福建境的闽越族群；如分读，那便是分指福建、广东两地。即甯氏家族族人当年到岭南任官，皆都是循沿海路线，从福建进入广东。所出“干蛊之任”之“蛊”为事，“干蛊”便是指父有过而子贤能。“迁移钦江”中之“钦江”，即钦州，亦即今广西钦州地。这便是说，他们经福建抵广东后，父子经过一番相争，这才由嗣子率领其族人向西南迁徙，直至于钦县“盘根”落下户籍，“繁衍陵穆”、“长为茂族”，发展成为强盛的旺族。

#### 跋语

先秦时期的岭南，它是蛮、越、陆梁、乌浒、俚、僚、黎等称谓族人的居地，秦汉以后，中原秦人或后来的汉称的族人，他们或为征战，或为出任官职，或为避灾逃荒，均曾相继徙入岭南，这便使得在岭南就居族人，增加了秦或汉称族人的成分，致使在岭南组成一支方言繁杂，民情、民性与习俗又是多样的民族大混合体。甯氏族人便是于此时间徙抵了岭南。

历史上的各民族，由于各自有着本民族的族源，各自有其不同的聚居条件与生存环境，这便使得在物质创造上，出现了各自的特色个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甯氏家族，要依据他们自南朝后的甯逵便出任着定州与安州刺史，甯逵的儿子甯猛力于隋，出任着安州与交州刺史，其孙甯长真，复任隋钦州刺史与甯越郡太守，次孙甯贇，又为钦江县正义大夫，其曾孙甯道务在唐，又续任新州与封州刺史，在岭南历史上，已享有“刺史世家”美称；于政治上，又一直是岭南西南部的当权者，是这一民族地区的民族首领等这些事实，由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便当都要比共处的其他族群进步、发达。这在地方民族史的研究上，都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课题。

至于该甯族人本持的秦或汉称族别，唐后于史家笔下所以会变成是岭南的土著、越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均和他们自南朝后便一直是当地土著的统治者和物质文化又较为发达进步有关，即出自历史的误会所致。

（原载《考古》 1989 年 3 月）